

目 录

关于呼伦贝尔“九·三”后一段政情的回忆

.....拉 一(1)

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成立始末

.....色尔森太(29)

伪满时期的凌升事件

.....额尔根巴雅尔(38)

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十三团

.....敖兴然(55)

关于呼伦贝尔“九·三”后 一段政情的回忆

拉 一

这里我所说的呼伦贝尔地方，是指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以北的地区而言。从一九四五年“九·三”光复，到四七年末，这一地区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仅将我个人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的情况回忆一下。但，由于我在当时担任的职务所限，有些重大的决策性的会议、会谈未能参加，细情了解得不够确切，加上又无文字记载，各事件中的有关人物、时间、地点等难免有不准确或遗漏之处，切望知情的朋友们给予指正。

一、海拉尔市自治公署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苏联对日宣战。

由于苏军飞机的轰炸和日本侵略者逃跑前的焚烧、爆炸，海拉尔市受破坏相当严重，好的建筑物几乎全被破坏。当时铁路归为苏军军用，民间交通、通信断绝，社会上是一片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这时，商业界人士傅锦堂（通俄语）出头露面，自称是苏联红军司令部任命的市长，组织了一个“海拉尔市自治公署”。地址在伪满中央银行海拉尔分行的旧址（现在的回民饭店楼的位置）。

市长：傅锦堂，副市长：陆然萍、色布精太。还有一个副

市长，我忘记名字。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那天，因公出我正在满洲里。伪满时，军管区兵事处到各旗市进行征兵检查，都要由伪兴安北省民生厅派人携带被征适龄人名册参加。当时，我正在伪兴安北省民生厅民生科主管民籍事务，这次伪满第十军管区兵事处到满洲里进行征兵检查，我被派携册随行。

八月九日早晨四点钟左右，苏军对日军开火，不到两个小时就占领了满洲里。由于交通断绝我被困在满洲里，隔了几天才乘苏军军用火车头回到海拉尔。

当时有些老同事和熟人，如敖平勋、奇伦巴图、索依尔、阿勒腾仓、桑杰扎布等人，都在傅锦堂组织的“海拉尔市自治公署”出来进去地混日子。我因没事可做，也在那里混了几天。因为当时苏军在街上抓人义务劳动，海拉尔市自治公署的人员，都作了个红布小圆牌子，打上印章挂在胸前，就可免除义务劳动。

傅锦堂在那个自治公署里，穿着打扮很象个样子，在他家门口还有一名苏军士兵给站岗。他天天高喊准备迎接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来到。意思是想闹个一官半职，可是他当市长的官运，只有两个多月就结束了。

二、呼伦贝尔蒙旗行政公署

苏军进驻呼伦贝尔后，以缴获战利品的名义，在牧区任意抢劫牧民的牲畜，陈巴尔虎旗全旗的牲畜几乎全被赶走。此外，从索伦旗（今鄂温克族自治旗）、东新巴旗、西新巴旗以摊派命令征购牲畜。苏军后勤司令部天天来找蒙古人的头面人物，当时额尔钦巴图（伪兴安北省省长）也不在海拉尔，牧区完全处于无人管的状态。所以在海拉尔蒙族中的头面人物德春、卓德巴等倡议，暂时先成立一个“呼伦贝尔蒙旗行政公署”的机

构，一是应付苏军和它交涉联络；一是与牧业四旗取得联系，了解情况。

一九四五年九月中旬，在原呼伦旅馆旧址挂起了“呼伦贝尔蒙旗行政公署”的牌子。参加这个机构的人员，除德春、卓德巴两位头头外，有我和敖平勋、奇伦巴图、索依尔、桑杰扎布、色文等人。

虽然把牌子挂出去了，可是没有分文经费，连个桌椅板凳都没有。为此，我和敖平勋去找海拉尔市自治公署的傅锦堂市长，借了几十元钱，刻了个印章，买了点笔墨纸张。又去伪满“国兵会馆”（当时已改称宴宾饭店）借了几个桌椅暂做办公用。

这个机构只是搭起个空架子，实际上也没有开展什么工作，到九月末就自然消失了。

三、国民党派李宗洲来海拉尔的活动

一九四九年九月下旬，苏军驻海卫戍司令官赫尔少夫上校派车，把额尔钦巴图由牧区接到海拉尔。正在磋商筹备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的前夕，国民党黑龙江党部派李宗洲来呼伦贝尔活动。李宗洲曾在奉天（沈阳）蒙旗师范和伪满工爷庙育成学院当过教师，因此与东蒙的一些政客和上层人物有些认识，他借这个渠道到呼伦贝尔来招摇撞骗、招兵买马，想给国民党立个大功，好闹个一官半职。其实，他完全错估了呼伦贝尔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少数民族的思想动态。可以说当时的蒙古人，从上层到青年，绝大部分人都反对国民党。

有一天，李宗洲跟随齐齐哈尔的金耀洲到额尔钦巴图的住所（现海市医院街）要求接见。当时，额尔钦巴图对接见他有些疑虑，但经过考虑还是决定接见他。

接见时，在座的有：额尔钦巴图、善吉密图普、功果尔扎

布。我当翻译。李宗洲穿戴很象个样子，从外表一看就象个资产阶级政客。他见到额尔钦巴图递上一张名片，名片上印着：国民党黑龙江党部蒙旗特派专员李宗洲。

接着，他寒暄了几句资产阶级政客的一套虚伪的话，然后就说王爷庙方面的博彦满都、哈丰阿他们都同意国民党在东北进行活动，这次来呼伦贝尔的目的，就是要在呼伦贝尔地方建立国民党党部，进行活动，以待将来接收大员来接收这个地区。而且带些恐吓的语气，要求额尔钦巴图给予协助和合作。

额尔钦巴图当即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额尔钦巴图说：“我们呼伦贝尔地方过去就有过实行自治的历史。现在我们已经获得解放，正在筹备建立自己的自治政府实行自治，不允许国民党在这个地区活动。而且东蒙的博彦满都、哈丰阿他们也不会同意在东蒙地区搞国民党活动，他们也正在搞东蒙自治运动。”

这个家伙撞了个钉子，就悄悄地溜走了。可是，当时的傅锦堂市长却把他当成上宾，在庆祝“双十节”的大会上请他发表演讲，庆祝宴会上奉为贵宾。过后不几天，据说怕自治政府抓他，偷偷地溜跑了，再没敢来。

四、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的成立

一九四五年九月末，一些人就着手筹备建立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的工作，地点在蒙古驻军司令部（现今海拉尔市公安局）。直接参与策划建立省自治政府的主要成员有：额尔钦巴图、善吉密图普、功果尔扎布、德春、平福、额尔很巴雅尔、朝克图等。

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宣告成立“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以原有的呼伦贝尔疆域内实行自治，当天举行了成立典礼，地点在海拉尔市人民法院旧楼楼上。参加典礼的人员有：额尔钦巴图、善吉密图普及政府的组成人员，还有将要参加政

府的工作人员，以及海拉尔、南屯一带的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自愿参加者近百人。当时的海拉尔市长傅锦堂也参加了成立典礼。苏军方面参加典礼的有：吉南·尼古拉伊奇·卡尔洛夫，与会时他身穿西服，自称是新闻记者。后来发现，他佩戴上校军衔，是中长铁路局的副局长。还有海地区苏军卫戍司令助理那札洛夫少校。

典礼开始时宣告：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成立。接着推举额尔钦巴图为政府主席，善吉密图普为政府副主席，宣布政府组织机构，主要成员名单，自治省政府管辖区域范围等。而后是额尔钦巴图就任政府主席讲话。苏军代表卡尔洛夫讲话后结束了会议。

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组织机构的主要成员

政府主席	额尔钦巴图
副主席	善吉密图普
参事	李栋朝
参事	德春
参事	嘎宁（苏侨）
政务处处长	哈达
总务科科长	额尔很巴雅尔
民政科科长	色文
文教科科长	托克塔克
财政处处长	战镇寰
财务科科长	图布信达賚
税务科科长	黎孤岛
实业处处长	卓德巴
产业科科长	色尔森太
工商科科长	应舞昆

交通科科长 张广信
公安处（后改称内防处）处长 平福
保安科（后改称内防科）科长 拉一
司法科科长 朝克图（不久张广信任科长）
主席秘书 敖平勋（后由朝克图任秘书）

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设在海拉尔市西四道街，即现今海拉尔市公安局院内。

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成立后，一个是政府本身开支经费如何解决？另一个是建立武装问题怎么办？还有，当时的海拉尔市自治公署的市长傅锦堂和自治省政府闹对立，天天叫喊等待国民党接收大员来接收。他手下有将近百支武器的公安大队，整天闹轰轰不知究竟干些什么，甚至有害于社会治安，市民们都有意见，连商界的代表人物也都有意见，苏军驻海卫戍司令赫尔少夫上校也对他很不满意，并建议额尔钦巴图撤换他。

上述几个问题，据我所知是这样解决的。

（1）自治省政府的经费问题。当时苏军作为由牧区征购牲畜的代价，给了一大批红军票子（数字不详）。由于物价日益上涨，红军票子日渐贬值。政府研究把部分钱作为资金，成立了“巴尔嘎蒙古合作社”。一部分借用作为政府经费，另部分钱和物资发给了牧业四旗的牧民。

（2）政府建立武装问题。苏军司令部只准许在市内建立维持治安的少数公安队伍。由苏军司令部拨给四支日造破枪，组织了二十人的“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保安队”。任务是保卫自治省政府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安全，协同海拉尔市公安局维护海拉尔地区的治安，属于自治省政府公安处（后改称内防处）领导。关于后来的变革情况另做记述。

（3）撤换傅锦堂的海拉尔市长职务，改组海拉尔市自治

公署。一九四五年十月下旬，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主席下令，撤销了傅锦堂的海拉尔市长职务，任命战镇寰为海拉尔市市长，重新组阁海拉尔市政府。将原公安科和公安大队解散，重新编成海拉尔市公安局。将原有枪支、弹药一部分留给新编市公安局使用，其余部分缴给自治省政府内防处。新市长战镇寰，副市长敖平勋，还有一名苏侨任副市长。

其他各旗市当时实际上都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铁路沿线方面：苏军刚进驻满洲里就组织了一个满洲里市政府，市长杨德正，副市长胡则宪，两人都是铁路员工。自治省政府成立后，杨德正亲自来海拉尔一次，拜见额尔钦巴图并汇报了当时满洲里市的情况。那年冬季，自治省政府召开旗市长会议，他派副市长胡则宪和一名姓韩的股长参加了会议。他们表面上还是服从自治省政府的领导的，但背地里又跑到长春与国民党东北行辕联络。

扎赉诺尔有个马岐山，也组织了一个扎赉诺尔市政府，他从来没有向自治省政府打过招呼。牙克石有个傅春山，是伪协和会的职员，通晓俄语。他组织了一个“牙克石街政府”。

牧业四旗方面：索伦旗（今鄂温克族自治旗）葆定任旗长，有少数工作人员和旗保安队维护治安。陈巴尔虎旗扎拉海任旗长，东新巴旗布恩博任旗长，西新巴旗陶格陶胡任旗长。

额左额右旗方面：一九四五年冬，自治省政府派政府参事通晓俄语的色仁与我两人乘苏军汽车去了三河一趟，了解了一些情况。当时苏侨占多数，可以说三河是苏侨之乡村。汉族除了分散经营小商和个体手工业外，个别的经营农业、牧业的也不多。那里的苏侨照旧自己管理自己，虽然离城市较远交通不便，但象粮食一类的生活必需物资都能互通有无。因距山很近可以就地解决烧柴，所以那一带百姓生活比较安定。

五、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内防处及 呼伦贝尔保安总队的变革情况

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成立初期设公安处，下设保安、司法两个科。后来，听到王爷庙东蒙方面的情况，是称内防部、厅、处、科、队等。所以，从一九四六年我们也把公安处、科改称内防处、科、股等，实际上业务没什么新的变化。现今的公安处、局的蒙译称呼按其文字直译为汉字的话就是内防处、局。

呼伦贝尔保安总队是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保安队的二十人逐步扩充起来的。当时我们也知道东蒙方面已经建立起“东蒙自治军”，只是因为苏军方面严禁在市内建立军队，所以不称军而称维护地方治安的“保安总队”。

一九四六年春节前后，海拉尔一带的情况已不是那么平静了。国民党分子造谣、挑拨蒙汉民族关系。国民党搞地下武装，组织黑军的就有三股势力。一股是袁师古（一九四七年夏被处决）组织的“光复军”第二十八团；一股是李桂萱、秦大为组织的“国民党保安大队”；还有一股是李泽明、何溥英组织的“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第六旅。这三股势力都在暗地里招兵买马，积蓄力量，以待苏军撤退后起来打垮他们所说的蒙古政府，迎接东北行辕的大员来接收呼伦贝尔地方。

当时，据苏军司令部说，苏军撤出是肯定的，确实时间他们保密不讲。所以，苏军撤退后保卫地方治安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当时兴安岭以东的情况不了解，只听说八路军在讷河一带，可是没有联系，只有扩充保安队来保卫地方的安全。

为了扩充保安队，一方面号召海拉尔、南屯一带被苏军俘虏释放的伪满军官、士兵自愿参加呼伦贝尔保安总队；另一方面，由内防处派人去牧业四旗征兵和买马。这样，在苏军撤退

前，呼伦贝尔保安总队兵力已达二百五十人左右。把原来的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保安队的牌子换成“呼伦贝尔保安总队”，总队部设在海拉尔市西四道街路北，现在的呼盟卫生防疫站的院内。呼伦贝尔保安总队受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内防处长的领导和指挥。保安总队队长阿迪雅，副队长有登登太、乌勒吉仓、恩克，连级干部有苏荣、郭忠良、吉格扎布、达木丁苏荣、根登苏荣、胡格吉等。

六、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与东蒙、 中国共产党的来往关系

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成立后，与中共、东蒙都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有过来往。就我所知，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份，中国共产党的苏林同志在海拉尔呆了一个时期。他在海拉尔期间，和自治省政府的首脑们接洽过，究竟谈了些什么，不了解。我们只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派来的代表。记得在一九四六年元旦，自治省政府在亚细亚西餐馆举行宴会时，也邀请他参加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党的同志，感到他诚恳亲切，平等待人。那时不知道“同志”这个称呼，只称呼他为“先生”。

东蒙的哈丰阿于一九四五年冬季，由王爷庙来海拉尔呆了几天。他同自治省政府的首要人物额尔钦巴图、善吉密图普、郭文通、哈达等人进行了会谈，具体内容不了解。在色布精太家举行的欢迎宴会我也参加了，哈丰阿在宴会上讲了他们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情况，和东蒙正在筹备召开东蒙人民代表会议，要成立东蒙自治政府的问题。至于将要召开的人民代表会议和要成立东蒙自治政府，是否包括呼伦贝尔地方，也没有明确表态。后来一九四六年二月，在葛根庙开的东蒙人民代表会议时，呼伦贝尔没派代表参加。

七、苏军撤退，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呼伦贝尔地方

苏军撤退之前，组织国民党光复军第二十八团的袁师古早就逃跑了，因而他那些喽罗们也就逃散了。李桂萱、秦大为组织的国民党保安大队，看形势不妙，通过当时的海拉尔市长战镇寰，自愿向自治省政府交待，接受自治省政府的处理。经研究把他们带有枪支的三十几个人，改编成“海拉尔市自卫团”，置于市公安局的监督之下，由伊士诺尔布管理。李桂萱被安置在内防处，秦大为进了海拉尔市公安局。唯有组织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第六旅的李泽明、何溥英很顽固，看样子非要在苏军撤退后大干一场。因此，于一九四六年四月中旬把他俩抓了起来，关押在呼伦贝尔保安总队院内，后来交给了民主联军处理的。这样，在苏军撤退前，在海拉尔地区的国民党地下武装，基本解散了。但是非武装的国民党分子仍有潜伏活动。

民主联军进驻后，于一九四六年八月间，在海拉尔地区对国民党分子进行了大检举。我们才知道在内防处、海拉尔市公安局，就有不少搞国民党地下活动的人。如高振武、张汉臣、张广信、谷昆五等等。

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苏军从海拉尔全部撤退了。当时是有些人心惶惶，再加上国民党分子造谣、挑拨蒙汉民族关系，事态颇为严重。对此，自治省政府出了安民告示，开了宣传会。呼伦贝尔保安总队和海拉尔市公安局，也加强了市内外警戒和巡逻，以安人心。

当时，象李栋朝、战镇寰等汉族的上层人物，也出面向百姓宣传解释说：“老主席（指额尔钦巴图）是信佛的人，他不会做出民族间互相残杀的坏事来……”在当时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

苏军撤退后海拉尔地区是很平静的，没有发生任何事件。

可在五月十日前后，由中长铁路苏侨员工那里接到一个情报，说免渡河有一部分光复军在闹事。为此，呼伦贝尔保安总队调动百来人，借用苏侨的四台卡车前往免渡河打那部光复军。同时指示索伦旗保安队派三十人的骑兵赶赴免渡河，清除旗辖地的叛乱。

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可是由于阿迪亚的指挥不当，途中在牙克石打尖耽误了几小时，这期间光复军获得了情报，做好了反击准备。等人马赶到免渡河时，对方掌握了战斗主动权。虽然打了一天，也没攻下来，战士孟常和阵亡。不得已又把队伍拉回牙克石，待整顿后再去攻。正在这时，有消息说由齐齐哈尔开往海拉尔的一列车军队开过来了，但不知是什么部队。有人说是国民党接收的军队等等。正当很紧张的时刻，突然从博克图来电话找我讲话。一通话才知道是自治区政府人事股长索岳勒毕力格打来的，说他从齐齐哈尔乘民主联军的军车返回海拉尔，路上不要发生误会，等等。得到友军八路军开来的准确消息，大家都很高兴，当晚就组织人乘汽车到哈克车站迎接民主联军。去的人有，政府政务处长葆定，政府参事、海拉尔商会会长李栋朝，海拉尔市长战镇寰，政府内防科长拉一，内防处股长何什格苏荣等人。

那时哈克是个小地方，吃住都不大方便，在一位苏侨家里蹲了一夜军车也没来，第二天早晨一行人返回海拉尔等待。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上午，东北民主联军由西满铁道司令郭维城、民主联军旅长王化一、政委苏林等同志率领，正式进驻海拉尔。从此长期遭受反动统治压迫的呼伦贝尔的各族人民，投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怀抱，这块地方也变成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安全大后方。

当天，到海拉尔车站迎接民主联军的有，呼伦贝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善吉密图普，以及政府主要成员和海拉尔市长战镇

寰、海拉尔商务会长李栋朝等各界代表。当天由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在海拉尔宴宾饭店举办了欢迎宴会。民主联军方面的郭维城、王化一、苏林等领导同志应邀出席了宴会。首先由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副主席善吉密图普代表政府致欢迎词。然后由郭维城同志代表民主联军指战员，热情洋溢地讲了话。在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来帮助东蒙人民实行自治。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全场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民主联军进驻我地方。下午，郭维城率部分队伍乘专列前往满洲里，自治省政府内防处长功果尔扎布陪同前往。王化一、苏林同志留驻海拉尔开始开展工作。

民主联军军列路过免渡河时，把以王杰为首的光复军全部缴械，这事大快人心，给呼伦贝尔地方治安开创了良好的开端。

民主联军进驻呼伦贝尔地方后，及时地给予了经济上的援助。一九四六年六月初民主联军的负责人苏林同志回齐齐哈尔办事。由自治省政府内防处的孟希明、苏常德随苏林去西满求援。到齐齐哈尔后，由于苏林同志的介绍与帮助，当时嫩江省主席于毅夫亲手批条，拨款嫩江地方款五十万元。这笔款解决了呼伦贝尔保安总队（后不久改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六师）更换了夏季服装和部分部队开支问题。

从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呼伦贝尔地方以后，铁路沿线的城镇，如海拉尔、满洲里、扎赉诺尔、牙克石都有了驻军，国民党地下武装光复军等黑军势力基本被消灭。治安已确立，民心也安定下来了。

接着党的高级干部朱光、张平化、王明贵同志等先后都来过海拉尔，做过时势讲话，宣讲过党的民族政策。朱光同志通过王化一同志特别找我谈过一次话，地点在海拉尔车站北二层小黄楼，当时是王化一的住处。谈话内容主要是了解国民党在海

拉尔的活动情况，还有对×××等人进行逮捕的意见，当地群众会有什么反响等等。朱光同志当时是嫩江军区副政委、齐齐哈尔市卫戍司令部政委。

八、兴安省政府迁移来海拉尔

一九四六年承德“四·三”会议上决定东西蒙统一，由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乌兰夫、副主席博彦满都，五月下旬在王爷庙召开了第二次东蒙人民代表会议。在这次大会上决定，撤销“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兴安省政府”。兴安省政府领导东部几个盟包括呼伦贝尔地方改称的“呼伦贝尔盟”。在王爷庙设“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东蒙总分会主任是哈丰阿。

兴安省政府主席特木尔巴根，副主席张策，秘书长方志达，财政厅长贾石等人为政府主要领导成员。

在军事方面，建立了兴安军区。司令员阿思根，政委哈丰阿，副政委张策，政治部主任胡昭衡。兴安军区领导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的一、二、三、四、五、六师。据我所知，第一师驻在王爷庙，第五师驻军扎兰屯，第六师驻扎海拉尔，其它三个师驻地不详。

一九四六年夏，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向东北解放区发动了猖狂进攻。在西部战场上，沿平齐铁路线进攻到郑家屯以北，战局是很紧张的。为此，在王爷庙方面的领导决定，留守部分强有力的领导和骨干力量，同敢于来犯的国民党反动派奋战到底。其余的政府人员和家属撤往安全地区。所以，兴安省政府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乘一专列迁移到海拉尔来了。

关于兴安省政府迁移一事，事前没向呼伦贝尔方面打过招

呼，只在前几天派先遣人员孟和济亚等人到海拉尔后才知道。当时都感到很突然，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主席额尔钦巴图，专门召开了政府工作人员会议，听取大家对这事的意见。大家都表示欢迎，没有其它意见，而且认为上级领导机关迁到这里来，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更便于指导和帮助。另外，兴安省政府有自己的财政经费，又有对自己工作人员和家属的供给制，给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增添不了任何负担，决定迎接。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上午十点左右，兴安省政府主席特木尔巴根、秘书长方志达，以及政府工作人员、警卫部队和家属们的专列安全到达海拉尔车站。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海拉尔市政府领导和各界代表兴高彩烈地在站台上等候。车停后，特木尔巴根、方志达首先下车和迎接的人见面。秘书长方志达代表兴安省政府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受到热情欢迎。

当天晚上，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在海拉尔宴宾饭店举办了盛大宴会，欢迎兴安省政府迁来呼伦贝尔地方。出席宴会的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主席额尔钦巴图，以下参事、处长、科长等，海拉尔市长战镇寰和副市长、科长等人员；应邀出席的有：兴安省政府主席特木尔巴根、秘书长方志达，以及处长、参议、科长一级的人员；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民主联军方面的领导人王化一、苏林等同志。

在宴会上，兴安省政府主席特木尔巴根响亮地讲道：“我们内蒙古人民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革命豪情。“九·三”光复后呼伦贝尔与东蒙和民主联军三方，这是初次欢聚一堂。听到革命领导同志对战局的分析，以及国民党政府政治上的腐败没落情况，使大家进一步增强了革命的信心。

兴安省政府迁海后，设在海拉尔市西大街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楼上办公。兴安省方面有一个关于呼伦贝尔盟政府机构的

设置方案，其中我清楚地记得有呼伦贝尔盟公安局机构方案，盟公安局下设一、二、三科和盟公安队。但这些方案由于情况变化都未施行。

兴安省政府来后不久，调整了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部分领导成员，撤换了海拉尔市长战镇寰，由苏林同志接任。撤换了应舞昆的自治省政府财政处长职务。

后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副主席、兴安省临时参议会会议长博彦满都，经阿尔山也来到海拉尔。

九、呼伦贝尔保安总队改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六师

一九四六年七月中旬，兴安省政府主席特木尔巴根主持，将呼伦贝尔保安总队改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六师。任命功果尔扎布为司令员，明善为参谋长，民主联军旅长王化一兼任政治委员，拉一任政治部主任。

第六师下设两个团，任命伊士诺尔布为第一团团长，德海源为第二团团长，登登太为师参谋处长。另设一个警卫排，全师兵力近四百人。师部设在海拉尔市西四道街现在的海拉尔市公安局院内。

一九四六年八月下旬，由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方志达等，在师部召集六师全体干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博彦满都宣布：在海拉尔设立兴安军区呼纳指挥部。司令员为特木尔巴根，政委兼参谋长方志达。还宣布将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六师改编为“呼伦贝尔地方自卫军”。任命登登太为司令员，伊士诺尔布为参谋长，额尔德尼陶克陶为政治委员，托克塔古为政治部主任，明善、郭美朗为军事参议。

呼伦贝尔自卫军下设两个团，一个警卫排。第一团团长布达希热，政委图们巴雅尔。第二团团长恩克，政委索岳勒毕力格。第二团驻扎海拉尔，第一团分驻在牙克石、免渡河、伊列

克得。呼伦贝尔地方自卫军在一九四八年撤销后改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九团。

在第六师改编为呼伦贝尔地方自卫军的过程中，涉及到我的个人问题。为了说明当时情况作一简述。召开六师全体干部会议前，关于改编的事做为政治部主任的拉一毫无所知。政治委员王化一同志也没有参加那次会议。会上博彦满都宣布了改编人事的任命后，他提到我从“九·三”光复后，对呼伦贝尔的地方武装的建立和维护地方治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有些成绩。为了使他深造，将要带领一批干部战士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去镀镀金。听到表扬自然很是高兴，事后经了解是六师内部有人中伤，说有国民党分子嫌疑。因而兴安省领导对我产生误会，所以在改编过程中未让参与，也没征求个人意见。为此，个人闹了情绪，几次向特木尔巴根主席提出要求澄清问题。而特木尔巴根主席只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讲革命形势和革命历史。方志达同志还给了一些革命书籍让个人阅读学习。

后来了解到造谣中伤的人了，但因现已不在人世就不提名了。其实造谣中伤人不外乎夺利争权罢了。一九四六年冬季的一天，方志达同志亲来“利民实业公司”找我谈话，当时他已调回西满分局，因工作关系常来往于齐海之间。估计那次也是顺便去找我的，谈话时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大公无私、襟怀坦白的，但在革命斗争中，由于情况不熟悉，同志之间有发生误会的时候，一旦弄清了就要解除它才对……”据理解，就是要我解除顾虑，好好工作。在谈话中他还讲了玛尼巴达拉已经坦白了搞国民党特务的问题，而不像有人想象的那样，逮捕玛尼巴达拉是冤枉他。

在这以前，王化一同志也讲过我们内部有人造谣中伤的事。王化一同志进驻呼伦贝尔地区后，我们经常有接触，他对人很诚恳、亲切，常讲革命形势和革命历史，这也是革命前辈

对我们少数民族干部的爱护吧。

六师改编地方自卫军后，我闲呆了一段时间，后来特木尔巴根主席找我，要我赶快继续工作，可以自己选择干什么都行。于是我向他提出要求，想要学习经济工作。这时兴安省政府正准备成立一个实业公司，就把我安排在实业公司。从此，我就成了兴安省政府所属人员。

兴安省政府迁海后，除秘书长方志达、财政厅长贾石同志外，党陆续派来了周康民、沈吉清、任光扬、罗永贵等一批老干部。由方志达、贾石、周康民等同志主持，创办了兴安省财经干部训练班，短期培训了一批当地出身的青年干部。这些年轻干部结业后，有的参加了地方群众工作队等单位的工作，其中部分人在成立“利民实业公司”时参加了公司的工作，像史钟美、褚英俊、王静茹等就是那时进公司的。

十、检举逮捕潜伏在海拉尔地区的国民党分子

一九四六年八月，由民主联军协同兴安省政府公安人员，检举逮捕了一大批潜伏在海拉尔地区的国民党分子。其中有原海拉尔市公安局副局长高振武及以下公安局人员，内防处的张广信、谷昆五等。牙克石的国民党光复军头头赵明相，海拉尔国民党挺进军第六旅的头头李泽明、何溥英（在押）和汉奸特务张兰洲等均被逮捕。经过审讯查实，按着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绝大多数予以宽大处理，有的安排了工作。顽固到底的赵明相和民愤极大的汉奸特务张兰洲等少数分子被处决。从此彻底改组了海拉尔市公安局，由民主联军的张夷同志担任了海拉尔市公安局局长。张夷调走后，由兴安省的嘎尔布僧格同志担任海拉尔市公安局局长。

十一、逮捕玛尼巴达拉

一九四六年春，玛尼巴达拉等代表东蒙古人民政府由王爷庙去了北平，向国民党政府要求自治。在北平期间，他背着代表团其他成员与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勾搭上了，并带领两名军统特务回到王爷庙。为此，于一九四六年九月初在海拉尔被我公安机关逮捕。据说捕后从他住处查获了电台密码和不少国民党的法币。

一九四七年“五·一”大会上，由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主任哈丰阿，专题向大会报告了逮捕玛尼巴达拉的事。

十二、海拉尔利民实业公司

一九四六年，海拉尔的工商业完全处于私人资本经营状态。有一个巴尔嘎蒙古合作社，也属于牧业四旗牧民集体所有。在金融方面，伪满纸币也使用，苏联红军司令部发行的红军票子也流通。当时东北解放区的其它省已经发行了自己的纸币或流通券。哈尔滨已经有了东北人民银行的票子，白城子也用上了辽北省发行的流通券。各省都成立了自己的实业公司或贸易公司，以统一掌握地区的金融和物资。为此，兴安省政府于一四六年秋初，为统一省辖内的金融、掌握经济贸易和物资，发行了兴安省政府流通券，通用于从满洲里到扎兰屯、王爷庙。发行的数目不了解。在这个形势下成立实业公司，与东北解放区各省进行通商贸易、调运人民生活必需的粮、油、布匹等物资是十分必要的。当时在王爷庙已经有个“东蒙实业公司”，但它的经济实力顾及不了呼伦贝尔和纳文慕仁地区。因此得另成立个实业公司。

“利民实业公司”是一九四六年九月初营业，初建时也叫

“东蒙实业公司”，在呼伦贝尔地方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带有“东蒙”这个字号的不大受欢迎。所以，后改称为“利民实业公司”。

兴安省政府出资两千万元。本公司设在海拉尔，资本占一千五百万元；“分公司”设在扎兰屯，资本五百万元。这是当地当时唯一的政府经营的企业。

利民实业公司的机构和组成人员：

经理周康民，副经理拉一，秘书拉玛色楞，会计科长任光扬，业务科长吕明欣，扎兰屯分公司经理沈吉清。

公司董事会，成员三人：

方志达、德春（代表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孟和济亚（兴安省留驻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人员）。

董事会是代表兴安省政府的监督机构。公司的经理、副经理定期向董事会汇报业务经营情况，听取董事会的意见。

兴安省政府迁移到扎兰屯后，扎兰屯分公司交给了纳文慕仁盟，改称为“纳文慕仁盟实业公司”。在齐齐哈尔市设立一个办事处，为与当地打交道方便和得到照顾，牌子挂的是“东蒙实业公司驻齐齐哈尔办事处”，若挂利民实业公司的牌号，人家不理解。

利民实业公司成立的主要任务：一、由齐齐哈尔、克山、依安、王爷庙等地调运粮食；二、由哈尔滨、齐齐哈尔调运布匹、纸烟、火柴等日用杂货；三、由当地收购一些外地缺乏的物资运出推销，换回本地缺少的物资；四、收购牧民、猎民的畜产品皮毛和山货；五、在门市部零售各种货物；六、向私商加工订货，承做白板皮大衣、毡靴等军用物品；七、向牧区运售粮面茶等牧民生活物资及其它。

到一九四六年冬季，公司仅仅成立的几个月的时间内，起到了操纵市场物价的作用，公司物价上涨市场也涨，公司落了

价市场也落价。公司经营的业务范围逐渐扩大，先后开办了粮米加工厂、毛纺厂、火柴厂。到一九四七年在东旗阿木古郎开办了分公司，在东旗那木古尔开办了分销办事处。

一九四七年春，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要成立“呼伦贝尔畜产公司”。资金三千万元，其中两千万元由地方自治政府筹集，其余一千万元由利民实业公司和巴尔嘎蒙古合作社分摊。为此周康民同志同我商量，决定投资五百万元，并让我担任呼伦贝尔畜产公司的董事兼副经理。

我到利民实业公司之前，特木尔巴根指示我说：“周康民同志是参加革命多年，有丰富的经验，熟悉贸易工作，为人诚恳忠实，要向他好好学习，听他的话，特别是同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联系方面多做些工作，因为你在此地比较熟悉情况，与各方面人物也都有联系。这样配合起来，公司业务进行得就会顺利一些了”等等。

我到利民实业公司，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只能老老实实向人家学习。公司的政治、业务、学习的领导，都由周康民同志来抓。我主要按照周康民同志的指示一面学习，一面去做。对外，特别是同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方面联系，出头露面的情况多一些。

同周康民同志在利民实业公司共事一年，确实感到他是非常好的革命前辈。他对工作勤勤恳恳，严肃认真，生活俭朴，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仅受公司内部人尊敬，也受到外部接触过的人的赞扬。他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爱护少数民族干部，对我个人在政治上、业务上帮助很多。

为说明周康民同志毫不利己的高尚风格，举一二例实事。一九四七年春节前，有几名同志去齐齐哈尔调运粮食。周康民同志将仅有的四块银元交给他们捎点挂面。公出的几位蒙古族同志悄悄地对我讲了这事，我对他们说：“周经理为公司辛辛苦

苦操劳，我们这么大的公司捎几斤挂面还能收他几块钱吗？”这样那几位同志回来将挂面和四块银元交给周经理，他说什么也不接收。另一次是周康民同志调往哈尔滨东北纺织管理局任副局长，临走时公司方面为了对他创办公司以来兢兢业业辛苦操劳表示感谢，也为了留点纪念，赠送给他一件皮袄筒子，实际上在牧区、猎区是平常的东西，而他坚决不收。后来公司秘书础鲁同志悄悄带到哈尔滨硬留在他家了。我谈这些是为了让年轻一代人，了解当年的革命老同志的思想作风和高尚品德。

十三、兴安省政府迁往扎兰屯

一九四六年八、九月间就有消息说，兴安省政府要往扎兰屯迁移。究竟为什么当时我不大清楚，但绝不像有些人揣测的那样，说呼伦贝尔方面排挤兴安省政府，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后来听兴安省政府领导和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领导们谈话中，都表示是为了革命的整体利益，也就是为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全局利益而采取的措施。呼伦贝尔搞地方自治与内蒙古自治运动并没有矛盾，相反是相互有利的。兴安省、呼伦贝尔地方双方经过协商，并通过东北局高层领导同意之后定下来的。

一九四六年九月下旬或十月初，兴安省政府由海拉尔迁移到扎兰屯。当时我因利民实业公司的业务公出在齐齐哈尔。兴安省政府迁走时，留驻一部分工作人员参加了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的工作。他们是：孟和济亚、德力格尔、额尔德尼陶格陶、特格喜博彦、昂如布、嘎尔布僧格、玛尼扎布。还有阿尔斯楞等公安人员参加了海拉尔市公安局工作。

兴安省政府迁到扎兰屯不久，方志达秘书长调回西满分局，贾石财政厅长调任西满军区驻满洲里办事处长。

十四、李、博协定。

一九四六年十月，兴安省政府迁到扎兰屯后，博彦满都一行去齐齐哈尔，同中共西满分局负责人李富春进行了会谈。当时我公出在齐齐哈尔住嫩江旅社，十月十日（双十节）在齐齐哈尔举行了几万人的反蒋反内战的示威游行。在嫩江旅社门前台阶上，有西满军区、嫩江省政府领导人邵式平、于毅夫等检阅游行队伍。博彦满都他们也在那里观看游行，随行的有巴西门仓、特格喜博彦。所以我才知道他们在齐齐哈尔同李富春进行会谈，并达成“李、博协定”。详细内容不了解，只有一条是与我公司业务有关的问题，就是李政委在会谈中答应每个月给兴安省政府拨二十节车皮（齐海之间），以便运输粮食和物资。从此以后，西满铁路管理局随时给批车皮，有时候郭维城局长亲自批条，从不推托，这给利民实业公司业务带来极大方便。也是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照顾。

十五、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呼伦贝尔地区恢复自治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东北行政委员会正式批准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成立地方自治政府。批准原文如下：〔摘自《东北日报》299期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即1946年）十一月一日〕

东北政委会批准呼伦贝尔地区恢复自治

〔本报讯〕东北政委会二十九日举行第九次常委会。会议主要议题为讨论呼伦贝尔地区要求恢复自治问题。据该地方自治政府主席额尔钦巴图呈请（略）以该地区在九·一八前原系自治区，日寇侵占东北后，其自治即被取消。现东北各省民主政府的最高政权机构业已树立，故特呈请东北政委会准予恢复自治。经各委员讨论结果，认为此项请求符合地方自治原则，

一致同意批准恢复自治，成立地方自治政府。

**东北局、政委会、民主联军总部
热烈欢迎额尔钦巴图等先生**

额氏对民主政府使呼伦贝尔获得自治备致感谢

（摘自《东北日报》352期，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本报讯〕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主席额尔钦巴图、副主席恭格尔扎布（功果尔扎布），经济厅长额尔钦（很）巴雅尔，秘书长葆定为答谢东北政委会批准其实行地方自治，于二十一日抵哈尔滨……

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后的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的机构设置是：

呼伦贝尔地方行政委员会是呼伦贝尔地方最高决策机构，组成人员是：额尔钦巴图、功果尔扎布、哈达、孟和济亚、苏林、高锦明、石福彬，其他还有谁记不清了。

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

主 席 额尔钦巴图

副主席 功果尔扎布

秘书长 葆 定

民政厅长 平 福

经济厅长 额尔很巴雅尔

保卫厅长 功果尔扎布（兼）

呼伦贝尔地方自卫军

司令员 登登太

参谋长 伊士诺尔布

政治委员 功果尔扎布（兼）

一九四六年冬，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拨给呼伦贝尔地方自卫

军枪三百支。自卫军司令部派恩克、何什格苏荣，由佳木斯在极保密的情况下，运回海拉尔来。一九四七年七月，特木尔巴根和周康民商议，让拉一兼任地方自卫军政治部主任，至一九四八年二月。

一九四七年九月，呼伦贝尔地方自卫军司令员登登太，派我去哈尔滨联系在哈尔滨设立办事处的事情。到哈尔滨后经李富春政委指示，由民主联军总部参谋处长苏静批准，在哈尔滨道里三道街设立了办事处，并发给了政治工作学习材料，如《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还有一些刊物等等。

呼伦贝尔审判厅

呼伦贝尔审判厅，是一九四五年冬成立的，东北政委会批准呼伦贝尔地方自治后保留。厅长是达木林扎布，检察长是特格喜博彦。

呼伦贝尔文化促进协会

呼伦贝尔文化促进协会的设置，是为执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呼伦贝尔分会的工作，它还领导呼伦贝尔青年团和呼伦贝尔妇女会。协会主任是额尔德尼陶克陶。

呼伦贝尔报社

报社的设备、工作人员是兴安省政府迁来海拉尔时带来的。省政府迁到扎兰屯去时，留给了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出不定期刊。

呼伦贝尔文工团

呼伦贝尔文工团前身是由文艺爱好者索依尔等人，于一九四五年冬自愿组织的业余文工团。每次演出都很受观众欢迎。

那时海拉尔没有电影院、剧院，是唯一的文艺团体。仅管当时有个“苏侨俱乐部”，有时放映苏联电影，但是只有苏侨才能观看。

后来，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接管了这个业余文工团，改

称“呼伦贝尔文工团”。一九四七年，地方自治政府由于经费负担重，不愿继续管这个文工团，致使要散台了。

为此，呼伦贝尔地方自卫军司令员登登太和参谋长伊士诺尔布商量，决定由地方自卫军接管该团，改称为“呼伦贝尔地方自卫军文工团”。人员有二十来人，团长是索依尔。现内蒙出名的作曲家通福、明太，当时都是该团的成员。

一九四七年初冬，内蒙古文工团来海拉尔演出。那时我代表呼伦贝尔地方自卫军与来的周戈团长接洽，谈关于我们文工团的同志都要求跟内蒙古文工团学习的问题。周戈团长很欢迎，并说在海拉尔演出后就去扎兰屯，在纳文慕仁盟演出时间长一些，到时把他们送到扎兰屯就行。这样，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中旬我率领文工团全体人员往扎兰屯。途中，在牙克石、免渡河给驻防的自卫军慰问演出后，到了扎兰屯。内蒙古文工团当时住在纳文慕仁盟政府办公楼（现扎兰屯师范学校），见到周戈团长把情况做了介绍，他就接收了。

呼伦贝尔保安司令部

一九四六年九、十月间，郑北辰、高锦明等同志陆续来海拉尔后，成立了呼伦贝尔保安司令部。司令员登登太（挂名），副司令员郑北辰（主管），秘书长高锦明。

司令部设在海拉尔市东四道街路南。在海拉尔的党内负责同志，如苏林、郑北辰、高锦明、刘继良、安平等，都住在那个院内。党内开会也在保安司令部，利民实业公司经理周康民同志常到那里开会。当时党组织没公开，推测是党委机关。

一九四七年，呼伦贝尔保安司令部改称为“呼伦贝尔公安总局”，由郑北辰负责。

一九四七年夏，郑北辰调离海拉尔后，由高锦明负责呼伦贝尔公安总局。还有部分武装称“呼伦贝尔公安总队”，由刘

世杰负责。

一九四七年二、三月间，内蒙领导人乌兰夫、哈丰阿、特木尔巴根、张策、博彦满都等去哈尔滨，与东北的领导人商讨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事宜之际，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主席额尔钦巴图、副主席功果尔扎布等也到哈尔滨参加了那次会议。结果，呼伦贝尔还是搞地方自治，自治政府继续保存。所以，一九四七年在王爷庙召开的“五·一”大会，呼伦贝尔地方未派正式代表参加。只有额尔登太、额尔根巴雅尔两人，代表呼伦贝尔地方列席了会议。

十六、中共纳呼工委成立。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内蒙派吉雅太同志来海拉尔，正式宣布中共纳呼工委在海拉尔成立，领导呼伦贝尔地方和纳文慕仁盟两个地区。工委书记吉雅太，副书记高锦明。

中共纳呼工委成立后不久，在海拉尔地区开展了“一条心运动”。铁路沿线城镇里民主改革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十七、撤销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成立呼伦贝尔盟，归内蒙古自治政府统一领导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副主席功果尔扎布，行政委员哈达，自治政府秘书科副科长都嘎尔扎布一行，前去王爷庙向内蒙自治政府请求经济援助。他们与自治政府领导人哈丰阿接洽后，听到内蒙自治政府领导人谈话，考虑到内蒙革命形势的发展，认为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应该归内蒙统一领导。这样，不仅是经济上有好处，其它各方面都有好处。回来向额尔钦巴图主席汇报了，额尔钦巴图同意撤销呼伦贝尔地方自治，划归内蒙统一领导。为此，

额尔钦巴图主席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晚，在海拉尔医院街他的家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撤销地方自治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呼伦贝尔地方自治行政委员会的成员额尔钦巴图、功果尔扎布、哈达、孟和济亚、苏林、高锦明、石福彬；中共纳呼工委吉雅太、呼伦贝尔地方自卫军方面的登登太、伊士诺尔布、拉一；地方自治政府的德春等。

会上，首先由哈达讲了去内蒙的过程和情况，并讲了撤销呼伦贝尔地方自治的必要性。他在讲话中引用了不少哈丰阿等领导人的谈话。接着额尔钦巴图主席发言，并征求与会者的意见。大家一致赞同撤销地方自治，归内蒙统一领导。会上顺利通过，并形成决议。然后，吉雅太同志讲话，他说：额尔钦巴图主席采取的这个步骤是非常适时的，也是非常明智的。他还引用了斯大林一段话说“革命走正常的路子容易，在革命拐弯的关头是不容易的。”

会上决议撤销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后，改称为“呼伦贝尔盟”。对“盟”的蒙文称呼都叫“础古勒干”。这次会上有同志提议“盟”要称“爱马克”为适宜。从此，在内蒙都称“盟”为“爱马克”。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在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二楼礼堂集会。额尔钦巴图主席正式宣布：从今日起撤销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改称呼伦贝尔盟，归内蒙古自治区统一领导。其机构设置、领导人的安排等，待由内蒙古自治区重新安排和任命。

当天晚上，中共纳呼工委书记吉雅太主持，在呼伦贝尔饭店举办庆祝宴会。出席宴会的有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呼伦贝尔地方自卫军、海拉尔市政府、铁路军事代表处等单位的负责人。中长铁路驻海拉尔的苏联方面代表波波夫少校，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一九四八年二月初，額尔钦巴图主席率领功果尔扎布、德春、哈达、宝音毕力格苏荣（女）、都嘎尔扎布等组成的“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代表团”乘专车前往乌兰浩特（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王爷庙改称乌兰浩特）。在车站受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哈丰阿，以及特木尔巴根、朋斯克、王再天等党政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在乌兰浩特期间，乌兰夫主席接见、设宴招待了代表团一行，并商谈了撤销地方自治政府后的事宜。内蒙古自治区举办专场文艺晚会欢迎代表团一行。

后不久，内蒙古自治区发布命令，下达了呼伦贝尔盟政府机构设置和领导人任命名单：

呼伦贝尔盟盟长	額尔钦巴图
副盟长	功果尔扎布
秘书长	德春
副处长	都嘎尔扎布
民政处长	平福
副处长	布彦毕力格
畜产经济处长	額尔登太
副处长	侯明向
公安处长	德力格尔
副处长	周家庆

一九四八年二月上旬，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参谋处长嘎尔布僧格来海拉尔，改编呼伦贝尔地方自卫军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独立九团。任命：

团长	苏荣
副团长兼参谋长	丹定扎布
政治委员	巴图巴根

以上只是凭回忆记述，难免有错漏不妥之处，恳切希望知情的读者多加指正。

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成立始末

色尔森太

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计二十六个月的时间里，亲身经历了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成立始末的过程。这里所记述的事实，全凭脑海里的记忆。事隔四十多年的漫长岁月，肯定有记错或遗漏之处，恳请知情者给予纠正和补遗。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对日宣战。从后贝加尔进攻的第一方面军迅即占领了满洲里和扎赉诺尔。紧接着出动大批空军，向日本关东军宇部四雄少将所指挥的独立混成第一百三十一旅团，在海拉尔地区的西北军事设施进行猛烈轰炸。顿时海拉尔市区炮火冲天。苏联地面部队也展开了迅猛进攻。日本军队企图凭藉苦心经营多年的北山要塞进行抵抗，但也很快土崩瓦解，向兴安岭方向逃窜。剩余残部投降缴械。驻守在海拉尔地区的伪国军第十军管区司令部所属第七、八团则从海拉尔地区向东南方向退却。到索伦旗锡尼河庙附近，见战势不利，在司令官郭文林中将、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少将等蒙古籍军官策动下，打死所有日本人军官，率部向苏联红军投降。八月十五日，苏联红军正式进驻海拉尔地区及中东铁路沿线各要站。并在海拉尔市、满洲里市分别设立城防司令部，维持地方治安。至此，饱受日本法西斯殖民统治之苦的呼伦贝尔各族人民，同东北广大人民群众一样，获得了解放。

呼伦贝尔自治省的成立 善吉秘图普、德春、葆定、功

果尔扎布等一共三十多人，开会讨论成立地方政府，维持地方秩序。当时，除少数人因为离不开寨以外，绝大多数人表示愿意参加筹建工作。都感到家乡解放了，有一个政府出来维持社会生活是非常必要的。德春、葆定、色布精太、海平、哈达、色尔森太等。先来到伪满兴安北省公署，这个房子遭空袭后，多数破坏已不能使用。在西山街找到一所比较完整的日本统治时期开旅馆用的房子，决定将省政府设在这里。然后向苏军代表吉南·尼古来维奇·卡尔罗夫和苏军驻海拉尔城防司令部取得联系，在他们的同意和支持下，召集海拉尔、南屯一带蒙古族、达斡尔族，如德春、哈达、拉一、色布精太、胡色文、平顺、海平，色尔森太一共三十余人开会，经过讨论研究决定成立一个类似维持会的临时机构。一方面开展地方事务的管理工作，一方面进行地方政权的筹建工作。大约经过一个多月时间，善吉秘图普和功果尔扎布、德者等人提议，委派奈勒尔图、胡色文二人前往东新巴旗音保力格，敦请额尔钦巴图来海主持将要成立的地方政府。额尔钦巴图欣然同意来到海拉尔。

额尔钦巴图到海拉尔主持召开了有善吉秘图普、功果尔扎布、德春、卓德巴、李栋朝（海拉尔商务会会长）等开会，研究呼伦贝尔地区政权组织机构和人选问题。一致同意这个政权的名称暂定为呼伦贝尔自治省，采用主席制。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下设参事若干人（考虑各民族成分）。并一致推选额尔钦巴图为主席，善吉秘图普为副主席、功果尔扎布（蒙族）、德者（达族）、李栋朝（汉族）、嘎宁（苏侨）等四人为参事。并决定省政府下设四处八科，拟定了处长和科长名单人选。政务处长：巴德玛、色仁。财务处长：战镇寰。民政处长

平福。内防处长：功果尔扎布。总务科长：额尔很巴雅尔。财务科长：海平。税务科长：黎孤岛。工商科长：伊悟礼。畜产科科长：色尔森太。保安科长：拉一。司法科长：张广信。

以上人事安排在十月一日召开的呼伦贝尔自治省成立的预备会议上，以省主席的名义提名就算通过了。

十月八日举行呼伦贝尔自治省成立大会。应邀出席的来宾有：苏军代表卡尔罗夫、苏军驻海拉尔城防司令、苏军后勤部负责人，苏联驻满洲里领事馆一等秘书密春，蒙古军代表达瓦等二十余人。

会议开始，额尔钦巴图以政府主席名义致开幕词。对各位来宾在百忙之中前来参加大会表示诚挚的谢意。对苏联军队和蒙古军队配合作战，解放了呼伦贝尔地区各族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并希望驻海苏军对呼伦贝尔自治省今后的工作给予支持和帮助。苏军代表卡尔罗夫代表驻海苏军致词祝贺。

大会通过了呼伦贝尔自治省成立的公告。当天晚间还在贝加尔饭店举行宴会。来宾及政府工作人员和海拉尔市各单位负责人共百余人。宴会进行中间，蒙汉各族青年即兴演出各种文艺节目，充满了亲切友好的气氛。

一九四六年三月，呼伦贝尔自治省改为呼伦贝尔临时地方自治政府。并以政府主席的名义任命了各旗市长，政府保安队，呼伦贝尔林业局等新单位的负责人。索伦旗旗长葆定，后恩克巴图，内勒布等。西新巴旗旗长托格托胡。东新巴旗旗长布恩伯。陈巴尔虎旗旗长吉拉海。额右旗旗长图蒙吉拉嘎尔。额左旗旗长西尼林、张布拉。海拉尔市市长战镇寰。副市长色布精太。政府保安大队长阿迪亚。呼伦贝尔林业局长色尔森太（兼）。

另外，自治政府任命郭文通为政府参事，并指派他为政府常驻哈尔滨代表，额尔登太从王爷庙调回来，做为郭文通的助

手常驻哈尔滨。

这里需要说明，呼伦贝尔自治省成立以前，海拉尔市已经有了政府，成立初期叫海拉尔自治公署，市长是傅锦堂。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成立不久，市政府就停止办公了。由自治省政府任命色布精太，平顺为正副市长。以后由战镇寰继任市长，一名苏侨任副市长。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一九四五年冬，中国共产党党员苏林同志来到海拉尔。当时，他没有公开身份，分别会见了政府主席和副主席，住在苏联侨民家里。开始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讲述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加强各民族团结，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并且帮助自治政府开展工作。那时海拉尔已经成立了苏联之友社，以后改为中苏友好协会，吸收了很多会员，设在海拉尔市西四道街。

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恢复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成立地方自治政府。一九四五年十月呼伦贝尔临时地方政府成立后，主席副主席与各参事共同讨论决定，根据呼伦贝尔地区历史上曾经有过地区自治的情况，故派常驻哈尔滨代表郭文通，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请示，恢复呼伦贝尔自治。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在中长铁路局长卡尔罗夫的参与下，主席额尔钦巴图、副主席功果尔扎布，参事德春、色仁等人共同讨论写出向东北局和东北政委会的呈文。六月，东北局通知郭文通要呼伦贝尔派代表到哈尔滨商讨呼伦贝尔自治条例草案等问题。前去哈尔滨的有：副主席功果尔扎布、参事德春、政务处长葆定、科长博音毕力格、色尔森太，还有郭文通、额尔钦巴图登太、色布精太等。到达哈市后首先会见了彭真、林枫等领导同志。并于第二天开始在东北局办公大楼开会讨论拟定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条例（草案）。东北局参加的有彭真同志、苏林同志，还有张秘书（彭真同志爱人）及几位工作人员，予以具体指导。开

会过程中，彭真等领导同志亲自到代表团住处问寒问暖，使大家深入感动。经过讨论，拟定了呼伦贝尔自治条款。代表们在哈尔滨工作了二十多天，返回海拉尔。十一月初，郭文通打来长途电话说东北局已决定批准恢复呼伦贝尔自治。东北行政委员会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举行第九次全体常务委员会，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批准该地区恢复自治，成立地方自治政府。并于第二百九十九期东北日报上公布，原文如下：

东北政委会批准呼伦贝尔地区恢复自治

东北政委会于二十九日举行第九次全体常委会，会议主要议题为呼伦贝尔地方请求恢复自治问题。

据该地方自治政府主席额尔钦巴图呈请（略）以该地区在“九·一八”前原系自治区，日寇侵占东北后，其自治即被取消。现东北各省民主政府最高政权机构业已树立，故特呈请东北政委会准予恢复自治。经各委员讨论结果，认为此项请求符合地方自治原则，一致同意批准恢复自治，成立地方自治政府。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

十一月一日

从此以后，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就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工作了。并经批准任命额尔钦巴图为政府主席，功果尔扎布为副主席、德春、李栋朝、郭文通为参事。政府机构也有所变动，设一处三厅，秘书处处长葆定、经济厅厅长额尔很巴雅尔、民政厅厅长平福、保卫厅厅长功果尔扎布（兼），还任命了各科科长等工作人员。有总务科长桑杰扎布、财务科长海平、税务科长黎孤岛、畜产科长色尔森太、工商科长尹悟礼、保卫科长拉一、司法科长张广信，另设税务局长色尔森太（兼）、林业局长色尔森太（兼）。

呼伦贝尔答谢代表团赴哈尔滨的经过。为了表达对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呼伦贝尔恢复自治正式成立地方自治政府的崇高敬意，额尔钦巴图亲自率领呼伦贝尔答谢代表团，于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达哈尔滨。代表团成员有副主席功果尔扎布、葆定、额尔很巴雅尔，陈旗旗长吉拉海。随从人员有色尔森太、多尔吉，还有常驻哈尔滨代表郭文通、额尔登太、色布精太等。代表团到达哈尔滨后分别拜会了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民主联军的负责人。第二天晚间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民主联军总部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答谢代表团。第三天东北政委会、哈尔滨市参议会也分别设宴款待，并举行文艺晚会，欢迎代表团。最后一天，额尔钦巴图主席举行答谢宴会。对各位领导的盛情接待表示深切感谢。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表示热烈拥护，对东北局、东北政委会根据党的民族政策，批准恢复呼伦贝尔自治，表示崇高的敬意。

彭真同志还以个人的名义设便宴，邀请代表团到他家做客。席间，彭真同志以他敏锐的政治家眼光，向大家详细的阐述了国内外形势，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必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必胜的必然趋势，全东北以至全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一定能够达到，使我们深受教育和鼓舞。他还深刻的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大汉族主义，压迫少数民族的罪行。进而申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民族政策，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同心协力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建设新中国各民族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在此期间，彭真同志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制定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条款。参加会议的有张平化、苏林等同志，呼伦贝尔有额尔钦巴图、功果尔扎布、葆定、额尔很巴雅尔等。地点在原瑞士领事馆旧址。会议经过两天讨论协商，根据呼伦贝尔特点和中长铁路等方面的关系，制定出五条十二款的呼伦贝尔地方自治原则。并决定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

府由西满军区管辖。十二月二十八日举行签字仪式，彭真同志代表东北局和东北政委会，额尔钦巴图代表呼伦贝尔签署了呼伦贝尔地方自治原则（附带问题）会议纪要（见附一）。同时决定，该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原来的“六项原则”即告无效。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原来的呼伦贝尔（见附二）地方自治六项原则，是四六年初在东北局具体指示下拟定出来，准备派郭文通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没去。因此，新的条款生效之日，重申原来的“六项原则”无效是很有必要的。

由于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属于西满军区管辖，答谢代表团又应邀去齐齐哈尔市进行访问。先后拜会了军区司令员黄克诚、政委李富春等领导同志，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和款待。还召开了欢迎大会，李富春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时内蒙古的吉雅太同志在场也讲了话。在齐市住了三天，由铁路安排专车返回海拉尔。接着召开了旗市长会议，宣布呼伦贝尔临时地方政府改为地方自治政府，在中共东北局和西满军区领导下，行使自治权利。

一九四七年晚秋，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派来吉雅太同志，经过一阶段工作之后，于四八年元月建立了中共呼盟委，取消了原地方自治政府，改为呼伦贝尔盟，吉雅太同志为书记，盟长和副盟长仍是原来人选。从此，呼伦贝尔盟在内蒙古党委和盟委领导下，开始谱写新的历史篇章。以上就是呼伦贝尔地方自治的始末。

（附一）：

呼伦贝尔地方自治原则（附带问题）会议纪要

（略）

为达到贯彻呼伦贝尔民主自治的目的，必须加强自治政府

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并加强民族内部的蒙汉各族之间的亲密团结，平等共事。为此，对目前各项重要问题，进行会议，作出下列决定（有删节）：

（一）行政方面

1、行政委员会，保持现状；

2、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要保护人民群众的工作活动，并给予帮助。对民主政治团体和群众团体，承认其合法地位。

3、关于地方行政权限，旗长由蒙人担任，市镇长由汉人担任，副市镇长由蒙人担任，旗不设副旗长，但有汉人居住的旗可设汉人参事，参事在旗长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4、蒙汉各族人民的权利和义务是一律平等。

二、治安方面问题

1、为统一领导公安机关，在海拉尔设公安局，在其他市镇设分局。军队人数，按每二百人为一人限定。旗保安队由旗公署直接领导。

2、将现有的呼伦贝尔保安司令部即行撤销。

3、铁路保卫任务，在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没有具备护路力量以前，由民主联军护路队担负。铁路护路队除担负护路任务外，不得介入其他事务；而地方政府和军队也不得干涉铁路行政和它的工作。

三经济方面问题

1、凡军队，对具有呼伦贝尔地方性质的进出物资，必须按地方自治政府所规定的税务制度缴纳税金。

2、西满、嫩江军区以及各机关的生产单位一律停办。

3、取缔苛捐杂税，建立合理的税务制度。

4、铁路护路队，对进出货物检查方面，应尽量协助自治政府税务部门的工作。

四、司法机构方面

司法机构，分设两级法院，第一级为旗市法院，第二级为呼伦贝尔地方法院。

五、本决定生效后，以前的六项原则即行取消。至于有关呼伦贝尔同兴安省及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事宜，双方可直接商定。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于哈尔滨

(附二)：

呼伦贝尔地方自治六项原则

- 一、呼伦贝尔实行地方自治，并组织地方自治政府。
- 二、呼伦贝尔自治政府在法律上属于兴安省。
- 三、呼伦贝尔在经济上、财政上保持其独立之预算与自主。
- 四、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组织地方自卫军与地方保安队，以保卫本区域或边界之公共安全。
- 五、为保卫呼伦贝尔游牧民之安静生活，它不向任何方面派遣军队或进攻，也不允许任何方面军队进驻呼伦贝尔或干涉呼伦贝尔之内部生活。
- 六、呼伦贝尔地区不得设县制，非经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之许可，不得再向呼伦贝尔移民开垦。

说明：呼伦贝尔地方自治原则（附带问题）会谈纪要，原来由蒙汉两种文字写出，因汉文纪要找不到，此文是根据蒙文译出的，故难免有错译之处，渴望知情者予以指正。

伪满时期的凌升事件

额尔根巴雅尔

伪满洲国时期的所谓凌升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谋杀事件。

伪满洲国兴安北省省长凌升（达斡尔族人）对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插手伪满兴安北省的“国策”十分不满，并敢于公开反对或抵制，日寇恼怒，蓄谋除掉他。

一九三五年六月，因哈尔哈庙地区归属问题，伪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双方同意，举行谈判。谈判会址设在满洲里，因此世称“满洲里会议”。“满洲里会议”满洲国首席代表是满洲国兴安北省省长凌升。

日寇借口凌升与蒙古代表有私下接触，诬为开了“秘密会议”，遂以“通苏通蒙”罪，于一九三六年三月逮捕了凌升等二十余人。四月，在满洲国“首都”新京（现长春市）将凌升、福龄、春德、华林泰四人杀害。沙德勒图判刑十二年，倭信泰判刑十五年。革职二十来人。日寇为隐其真象，而宣称“凌升‘通苏通蒙’事件”。

为白于天下，仅以我个人在这次“事件”中的所见所闻，叙述于后。

凌升被害的原因

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以“通苏通蒙”罪名加害凌升呢？情况

是很复杂的，据我所知略述于下：

“九·一八”事变后，凌升以呼伦贝尔地区代表的名义，参与了满洲国的“建国”活动。他被任命为兴安北省省长。其父，原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被任为伪参议府特任官参议。日寇本打算以官职来笼络凌升等人，为日寇效劳，但凌升等人没有就范。日本人蓄谋已久，早存杀机。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以“通苏通蒙”罪加害于他，伪满军法会审宣布的《凌升等通苏通蒙公报》上，所列的“罪状”是：凌升通过曾任兴安北省警备军骑兵第七团上尉团副沙德勒图（当时已退役）和兴安北省警务厅警尉倭信泰二人做情报活动。

但“公报”上说得颠三倒四，东拉西扯，矛盾重重。我认为“通苏通蒙”是可以公开的“间谍”罪，而不便于公开的才是真正的杀人原因，有以下几点：

1、辛亥革命爆发清皇朝被推翻后，日本帝国主义扶助清皇族肃亲王，组织了以复辟清朝为目的的“宗社党”，策划组织由日本帝国主义操纵的傀儡政权。早与日本人勾结而起家的巴布扎布，也乘机参加了这次阴谋活动。巴布扎布为了扩大他的势力，经日本人游说，企图把呼伦贝尔当局也拉入他们的阴谋活动。但受到了呼伦贝尔副都统胜福，和他的得力助手凌升等人的拒绝，日本人的阴谋没有得逞。巴布扎布死后，日本人又扶助巴布扎布的残余“副统领”色布精额，率领二千余人，于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春攻占了海拉尔。在此危急时刻，在胜福和车和扎的指挥下，凌升等积极组成讨伐军，终于把色布精额匪军逐出呼伦贝尔边境。这样，日本人的阴谋活动又成泡影。这笔帐，日本人是不会忘记的。

2、一九二九年冬，中东铁路事件发生。东北军与苏联军交战。双方停战达成协议后，苏军撤退时，苏军司令员与凌升会晤，举行秘密会谈。双方商定：一旦苏日战争发生时，呼伦

贝尔向苏联靠拢，云云。满洲国成立后，国务院兴安局日本人参与官菊欣××曾向凌升质问有否此事。但日本人考虑到此事发生“九·一八”前，而且最重要的是，伪满建国伊始，有必要进一步拉拢凌升，为他们忠顺效劳，把此事不了了之。

3、“九·一八”事变后，嫩江桥的血战，揭开了北疆武装抗日的序幕。一九三二年十月，驻扎在呼伦贝尔地区的爱国将领苏炳文旅长，率领第二旅在海拉尔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向全国发表通电，坚持抗战。这时，身为兴安北省省长的凌升，竟然响应苏炳文的爱国抗战行动，予以支援。而苏炳文率部退入苏联境内时，苏炳文给凌升留上了机枪、步枪等武器，并给了写有“铁血救国”字样的袖章。凌升的这种举动，当然激怒了日本关东军，在心里给他又记了一笔帐。

4、“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炮制建立满洲国的方案时，凌升没能看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存有幻想。想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摆脱东北军阀势力的统治，保存内蒙地区的地方势力。因而他参与了建立满洲国的阴谋活动。满洲国成立后，凌升被任命为兴安北省省长。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并吞东北的“大陆政策”，从中央到地方统治机构，都派有日本人官吏。如，满洲国国务院下设总务厅长官制，各部设次长制，各省设次长制（兴安四省设参与官制），各县设副县长制，各旗设参事官制。上述官职都是日本人充任。这些人名义上是“辅佐者”，实际上是实权派。这样，国务总理大臣、各部总长、各省省长、各旗县长只不过是傀儡，实权都掌在日本人手里。这些日本人以统治者自居，发号施令，为所欲为。

在这种情况下，凌升不甘心当傀儡，把日本参与官当成客人对待。有事愿意商量就商量，不愿意商量就不理参与官。不通过自己的事，他不承认。对日本人不是唯命是从、百依百

顺。而是坚持己见，分庭抗礼。甚至连关东军派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的话都不听从。凌升被日本人认为是“不老实的人”。

5、“九·一八”前，凌升与中东铁路局的苏方代表人员结成良好私交，来往频繁。即使是满洲国成立后，凌升与苏方仍然保持着良好关系。

此外，满洲国成立后，汉奸们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子女送往日本国学习日语，而凌升却把自己的儿子送哈尔滨铁路法政大学学习俄语。这样，更引起日本人对凌升的怀疑。

6、“满洲里会议”期间的凌升。

为解决哈尔哈庙归属争端，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双方举行谈判。谈判会议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在满洲里举行。

“满洲里会议”伪满代表：兴安北省省长凌升（首席代表）、兴安北省警备司令官乌尔金（少将军衔）、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神吉正一、海拉尔特务机关长斋藤正锐（会议期间伪称政府官员）等四人。随员：外交部驻满洲里办事处官员（日本人）、蒙政部事务官正珠尔扎布（日语翻译、联络员）、海拉尔警察署科长（后任兴安北省警务厅长）春德、秘书官华林泰、兴安北省警备司令部嘱托猪口三藏（蒙文翻译、联络员）、兴安北省警备司令部翻译额尔很巴雅尔（会议记录员）等十余人。

蒙古方面代表：外交部次长桑布（首席代表）、东部边防军军团长丹巴（中将）、政府委员多克索木、随员其米德多尔吉等共十人。会议从一九三五年六月开始。会谈的主题是“哈尔哈庙归属问题”，这是会谈前双方商定好了的，但正式举行会谈后，日伪方面撕破了商定，提出除会谈哈尔哈庙归属问题外，也可以商谈其他问题，但遭蒙方拒绝。日伪方面企图用武力压服对方，在会谈期间悍然制造了“霍勒斯太果勒事件”，提出无理要求。结果，哈尔哈庙一带的归属问题没能得

到解决，到十一月，会谈以决裂告终。日本人的阴谋诡计又一次遭到失败。

会谈期间，每次会前伪满方面代表开会讨论对策时，以关东军代表自居的海拉尔特务机关长斋藤正锐，强行布置发言内容，并规定首先由凌升发言。对此，凌升感到不满，认为这是鹦鹉学舌。有时提出异议与之争辩。

更为主要的，本来关东军企图利用会谈机会通过凌升窥探蒙方动态，甚至拉拢蒙方代表。但结果从凌升身上没有得到一点好处，为此责备凌升不为日满卖力、心无诚意。凌升与日本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明显起来。

7、凌升在兴安四省省长会议上的反抗。

日本关东军为适应殖民统治和掠夺资源的需要，将伪满中央政府机构不断进行扩大和改组。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将国务院的兴安总署扩为蒙政部，以便推行蒙汉“分而治之”的政策。齐默特色木杰勒任蒙政部大臣，日本人依田四郎任次长。为强化推行内蒙地区的殖民统治，伪蒙政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在“新京”召开兴安四省省长会议。依田次长主持会议，日本关东军主管蒙事的参谋片仓衷等也参加会议指挥。在这次关东军直接控制的决策会议上，凌升代表四省提出很多反对意见，态度严肃、言辞尖锐，弄得与会的关东军参谋怒不可遏。

凌升提出的意见，都是关系到“国策”的重要问题，列举几例：

①从日本内地移民问题。

日本移民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移民地区包括兴安东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的广大地区。土地是人民的命根子，失去土地，对人民是最大的危害，针对这个要害问题，凌升提出了严厉的反对意见。

②反对日本人官吏。

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政府的控制，是通过在满洲国任用日本人官吏进行的。伪满洲国建立伊始，即一九三二年三月十日，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秘密换文中写道：“敝国（指伪满洲国）选有达识名望者任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物之选定，委诸贵军司令官之保荐。其解职，也应商得贵军司令官之同意。”（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1840—1945，下，1955年版，第216页）。由此，在伪满政权中任用日本人官吏一事，伪满初期就确定了。根据秘密换文的规定，伪满政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署的实权，都被日本人官吏把持。从内蒙地区的兴安四省的情况看，到一九三六年各省早有日本人的参与官，各旗有日本人的参事官把持着实权。所谓当地人的省长、旗长只不过等于虚设，有职无权。针对这个严重问题，凌升也提出了反对意见。

凌升对土地国有等重要问题，也提出了反对意见。

综合凌升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行动，构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施行殖民统治的一大障碍。日寇为了掩盖其法西斯的狰狞面目，以“通苏通蒙”的罪名杀害了凌升等四人。

“凌升事件”中我所经历的片段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七日的早晨，乌云笼罩着呼伦贝尔大地。刚刚破晓，早起的爱人为准备早点，出去取柴。她没有拿来柴草，却惊慌地跑回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房前房后被日本兵包围了，枪上都上着刺刀，怕死人啦，你快去看看……”我不以为然地说：“你不要大惊小怪，也许是日本兵举行军事演习。”她忙说：“不象演习，一定出了什么事了。”我出门一看，果然不象演习。平日日军演习，一般不进村，即使进村也不像这回那么凶。我急于要到工作单位——索伦旗公署探看

一下究竟出了什么事。不料日本兵不准出大门，我拿出工作证和名片，说：“我是旗公署的职员，要去上班。”日本兵班长在我名片上写道：让这人去旗公署，才放我出门。路上全是日本兵。

当时旗公署内，日本人职员都已上班，而当地人都没来。不久，旗公署参事官原田俊一派日本警察把当地职员召集到旗公署，原田宣布：“这是日本军部的行动，任何人不得违背，不得乱说乱动。”我悄悄地找到总务科长哈达，想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也不清楚，只说：“看样子一定出了可怕的事。”

中午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发现春德家木板墙上贴着驻海拉尔日本军部的戒严令，主要内容是：检举思想不良分子，逮捕反满抗日的不逞之徒，等等。所指很具体，觉得事情非常严重，不知大祸落到谁的头上。我意识到日本人要在南屯抓人了。首先使人不安的是，自从蒙古人民革命到“九·一八”事变前夕，在海拉尔、南屯、莫和尔图聚居的达斡尔族青年中，去蒙古、苏联学习的人为数不少，有的人留在蒙古，有的返回来做地下宣传工作，也有的曾参加郭道甫领导的一九二八年呼伦贝尔青年暴动。在日本人看来，这些青年都是“赤化分子”郭道甫的党羽、徒弟和亲信。日本帝国主义自侵占我国东北，侵入呼伦贝尔地区以来，对这些人暗中追踪、监视。戒严令所指“思想不良”、“反满抗日的不逞之徒”等，是不是指这些人呢？如果是这样，难免要被一网打尽。那么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郭道甫的学生，加上郭又是我的姑父，关系密切，愈想愈感到事情严重。我叔叔听了戒严令，显出格外恐惧。他名叫阿达，字瑞盛，号德培，早年加入呼伦贝尔青年党，曾出席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参加过一九二八年呼伦贝尔青年暴动，又是郭道甫的小舅子，日本人肯定认为是

思想不良分子。

第二天，我下班回家刚吃过晚饭，突然五个宪兵、两个日本警察把住大门和屋门。班长级的两名宪兵冲进屋开始搜查，把所有的蒙文信件、笔记本装在一个提包里，然后对我说：“宪兵队长有事和你谈，现在跟我们走！”

从南屯到海拉尔不过二十华里，汽车却走了一个小时，路上日本兵戒备森严，连日本宪兵队的汽车也要停车接受盘查。

海拉尔日本宪兵队部，在俄侨中学与海拉尔车站之间，两层楼被高墙围住，阴森可怕。我早就知道在这楼房里不知死了多少爱国志士和反满抗日的英雄。人们把宪兵队称为“阎王殿”，称戴黑色肩章的日本宪兵为“黑脖子魔鬼”。我被押进“阎王殿”就有一种与世永别之感，纵有思绪千万，只抱住一个念头：不管受到什么样的严刑拷打，绝不能连累他人。晚上十点多钟我被押进拘留所。

拘留所内有四、五个小牢房，小牢房是日本式板炕。墙上只有一个用钢筋钉的小窗户，举手够不着窗台。前面是铁栅栏，中间一个很矮的铁门，几乎得爬着进出，门旁有个小窗孔，是用来递送饭食的。墙角地上有一个窟窿，是大小便池，屋内臭味难闻。牢房内容纳四人，白天只准背对背坐着，不许交谈。

夜深人静，从左右隔壁听到咳嗽声、呻吟声和疼痛难忍的哼哼声。从这不同的声音中，我已认出了伪兴安北省警务厅长春德、会计科长葆定、西新巴旗警务科长拉玛迪、东新巴旗警务科长春海、警务厅警尉倭信泰，还有曾任警备上尉连长的沙德拉图等十来人，已被押在这里。

我纳闷，这些人当中除春德是我家家族叔叔外，其他人与我没有亲属关系，平时也没啥往来。象拉玛迪、春海、沙德拉图等，也并不是“赤化分子”郭道甫的党羽、亲信，那为什么

也被抓了呢？更使我吃惊的是，春德系伪满特任官参议、贵福的女婿、兴安北省省长凌升的妹夫，他本人又是警务厅的厅长，为什么事也被抓了呢？思前想后一夜没睡。

第二天晚上，来了两个宪兵把我押到二楼的一个屋子，这是阴暗沉沉的刑房。屋里有钢鞭、铁钩、钢夹、木棍等各种刑具，有的刑具形状古怪，我叫不出名称。

审讯人是宪兵上士主持，他问：“你认识凌升吗？”

“认识。”我说。

“凌升现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我说，“我只知道他在一个月前到新京开会去了。”

问：“你去过满洲里会议吗？你做的什么工作？”

“我在满洲里会议上做蒙文记录工作。”

问：“是不是凌升派你去的？”

“不是凌升派我去的。”经我这样的答复上士班长很不满意，气急败坏地问：“那么，谁派你去的？你不老实！”

“我在省警备司令部做翻译工作，是司令部派我去的。”

宪兵班长笑咪咪地换了个话题说：“现在有一个问题，你要如实地说出来，对你有好处。”他接着问，“满洲里会议期间，凌升是不是与蒙古代表私下接触过？开了什么秘密会议？谈了什么问题？”

“这事我不知道，也没有听说有这事。”

他说：“你不要害怕，只要你说出来，马上放你出去。”

“实在不知道。”我说。

“你应该知道的，你也参加了！我们掌握着可靠的材料，你还想瞒过去吗？”

我再三说不知道，宪兵暴跳如雷骂道：“巴嘎亚路（他妈的）！”而后，一个劲地打我耳光。我仍然说“不知道。”他

没了办法，又假惺惺地说：“我们队长说，你很年轻，如说实话，马上放你回去。如不说实话，那后果是不可想像的！你要知道，宪兵队没有证据，是不随便抓人的。给一天时间，你好好想一想。”

经过这次审讯，我明白了被抓的原因。

第二天晚上，又在楼上刑房里审讯，仍是那个班长，一开始就态度凶狠地问：“你想得怎样，凌升在什么地方与蒙古代表秘密接触的？有谁参加，谈了什么问题？你老老实实说。”

“实在不知道，听也没听说。”我说。

他怒冲冲拿起剑刀往我头顶上、肩膀上乱打。打完继续问，我说不知道。他让宪兵拿来细绳把我双手连着脖子绑起来，将我推倒在地板上，鼻子出血不止，呼吸也困难起来，才停止拷打，拉进牢房。

这两天，被抓的人同样都被严刑拷问，有的被打得遍体鳞伤，失去知觉，象春德、葆定等被打得吐沫、吐血，好几天不能站起。

第四天，班长让宪兵拿来步枪子弹，夹在两个指头中间，两人使劲往下压，顿时疼昏过去，等醒来后，宪兵恶狠狠地问：“满洲里会议期间，你是不是和凌升同吃同住？”

我作了说明：会议前半期，凌升和乌尔金不在一起住，凌升、春德、华林泰三人住在满洲里西头的外交部驻满洲里办事处的官舍，乌尔金住在东头的俄人房子。我晚上跟乌尔金同住，白天在凌升住处办公。而后半期，凌升、乌尔金、春德、华林泰、正珠尔扎布和我，还有日本人代表神吉正一，都集中在俄人开办的尼基金旅馆。宪兵翻了档案、记录本，才没吱声。

又过了五天，对我的审讯换了春德的内容。审讯的主持人换了另一名上士班长，一开始他就问：“你在索伦旗当科长，

是不是春德派去的？”

“不是，是索伦旗长要我当科长的。”我说

“索伦旗长叫什么？”

“他叫恩明，是我的姑父。”

又问：“春德给你什么特殊任务？”

“没有。”

宪兵气势汹汹地说：“春德不是你的叔叔吗？”

“是我的叔伯叔叔。”

“正因为是你叔叔，才安排你在索伦旗工作，给你布置特别任务，不然，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会当上科长吗？”

我说：“我来索伦旗工作的事，春德根本不知道。”

“不老实，打死你！”宪兵咆哮着动刑拷问到深夜。

在这期间，一天晚上日本宪兵队队长来到春德的牢房（我的隔壁），装出安慰的样子，问身体怎么样，吃得怎么样，又说：“我们个人之间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上级的命令不得不执行。”听春德说：“我的问题早就交待清楚了，至于凌升通苏通蒙问题，我一概不知道，硬逼我说，这毫无道理。”呆会儿又听说，“你们给我纸笔，以便把我的问题从头至尾写出来。另外必须准许我抽烟。”等。宪兵队给了他纸笔和烟，春德整整写了一天。第二天上午春德被叫去，再也没回牢房。后来才知道他和凌升、福龄（凌升胞弟）、华林泰（凌升的秘书）被押送新京一起被杀害。

自从春德走后，拘留所管制不那么严紧了，只有不带枪的看守进进出出，也不大喊大叫了，被押人松了一口气。

又过了四、五天的一个早晨，忽然打开关我的牢门推进来一个人。我认得他是兴安北省公署总务科长双海，他一个月前随凌升去新京参加兴安四省省长会议的。我低声问他从哪里、什么时候来的？他说，他和华林泰二人，在省长会议闭会的当

天晚上，被日本宪兵司令部抓去，不几天被押送海拉尔日本领事馆警察所关押，今天又解送到这里。

又过了七、八天，把双海移到另一间牢房，推进来一个人。这人是海拉尔市政管理处的顾问，名叫梶原某。满洲里会议期间，好几次去满洲里见凌升。我低声问他为什么被抓？他说也是为凌升的事被抓的。我不解地问：“难道还会怀疑你吗？”他说，“你不知道吗？我是高丽（朝鲜）人嘛，没办法。”过了会儿他又说：“凌升这个人胆子大，性情倔强，不怕强暴，讲义气，敢与宪兵据理力争，凌升对宪兵说：“我早就意识到你们日本人对我不满，恨之入骨，早晚要干掉我，这我不怕……我的事我一人知道，别人不知道，尤其是年轻人更不知道。事情由我一人承担，不要牵累别人……”我问梶原怎么知道的这些情况？他说，二楼上审讯凌升时，我在隔壁房间被审讯，听到的。我问他，为什么把你也抓来了？他说：“凌升平时很信任我，有事经常和我商量，尤其是满洲里会议期间，我好几次去满洲里见他。所以日本人对我产生怀疑，说我是凌升的心腹。”

梶原被关押二十来天后，一天早晨被叫出去再没回来，我被释放后一直没见到他，他也不在市政管理处了。

三个月的关押生活终于熬到头了。一天上午九时许，一个宪兵拿着名单喊叫姓名：双海（伪兴安北省公署总务科长）、春海（东新巴旗警务科长）、拉玛迪（西新巴旗警务科长）、额尔很巴雅尔（索伦旗公署行政科长）。我们走出牢房，被领到一个办公室。办公室中间站着—个宪兵上尉，旁边有伪兴安北省警务科长坂水梧郎。宪兵上尉把我们四人姓名—一核对后，气冲冲地说：“今天上级宽恕你们，放你们回去。今后不得胡闹，要安分守己，不得违反国法，明白了吗？”

坂水梧郎是从省公署来接收我们的，他装模作样地说：

“你们辛苦了，我是奉蒙政部次长依田的命令来接你们的……”他领我们到省公署会客室，依田站在会客室中间训话，大意是：凌升等人很不老实，胆敢反对日满国策，与苏联、蒙古私通，犯了逆天大罪。这是国法绝不能容忍的，对他们四人业已处以死刑。对你们这些人实行“宽恕”，不予论罪今后要安分守己，不得乱闹……

这时才得知，凌升等四人被日寇杀害。

我们被放后，虽与家人团聚，但却在特务警察的暗中监视之下，时时提心吊胆。

凌升等所谓“通苏通蒙事件”中计凌升、福龄、春德、华林泰四人判处死刑，沙德勒图、倭信泰二人分别判十二年、十五年徒刑；被革职的有：伪兴安北省公署总务厅长荣安、总务科长双海、会计科长葆定、海拉尔市政管理处长德春、索伦旗长恩明（凌升的叔伯兄长）、西新巴旗公署警务科长拉玛迪东新巴旗公署警务科长春海（春德之表兄）、索伦旗公署行政科长额尔很巴雅尔、满洲里办事处处长龙登布（春德之兄）和海拉尔警察署长、扎赉诺尔警察署长等二十来人，余者姓名记不清了。

“凌升事件”后，兴安北省公署人事大更动，除原有日本参与官外，新派来日本人总务科长、会计科长、地方科长。警务厅的警务科长坂水梧郎代替春德升任警务厅长。所有科长几乎都由日本人接任。实权完全控制在日本人手里。至此，呼伦贝尔完全落在日本官吏控制之下。

附：凌升等四人的传略。

凌升，原名福贤，字云志，达斡尔族，莫尔登丁氏人。一八八六年生于海拉尔市郊西屯。其先祖依信阿和明信阿兄弟二人，于一八〇三年（嘉庆八年）奉命从戎，由嫩江流域布特哈

地方移居呼伦贝尔地方，编入索伦右翼正黄旗第一佐（今归鄂温克族自治旗）。凌升是原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的长子。幼年随其父学习满文，稍大入满蒙八旗学校学习汉文，学习成绩优异。凌升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经常关注国内政治动向和时代潮流的变改。

青年时代，曾充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笔帖式、案公、司官等职。那时被誉为是一个沉默寡言、锐敏慎重和远见卓识的青年官员。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清廷在包括呼伦贝尔在内的蒙古地方，推行移民实边政策，行省设县。在呼伦贝尔地区，设兵备道，在本署内只设蒙旗股，以代替副都统公署的行政权，副都统公署名存实亡。移民滥垦土地，蒙旗牧民的广大牧场遭到严重破坏，激起蒙旗官员和牧民的普遍反感。当时任额鲁特旗总管的胜福和陈巴尔虎总管车和扎为首的各翼佐官举兵反抗。遂于一九一一年一月攻占海拉尔城，驱逐兵备道黄仕福，并前后占领胙滨府（即满洲里）、室韦（即吉拉林），宣布“独立”。在这次“独立”过程中，年轻的凌升，作为胜福得力幕僚，积极参与，出谋划策，被誉为“谋士”，遂被任命为副都统公署右厅帮办。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巴布扎布残部色布精额“副统领”，率匪军两千余人，攻占了海拉尔城，整个呼伦贝尔地方沦陷在匪军手里，各族人民遭到匪军的蹂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这危急万分的时刻，作为主战派的凌升，在胜福和车和扎的指挥下，积极带头组织讨伐军，一举打退了色布精额匪军，收复了海拉尔城。在平息匪军之际，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右厅正堂成序、官员福尔格图（又名武奎）以及卓德仁佐领等多人牺牲。

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于一九一九年七

月声明，废除历届帝俄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协定。由于凌升的积极努力，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呈请东北巡阅使，转请中央政府取消“特别区域”，废除沙俄强迫北京政府签订的《中俄会订呼伦贝尔条件》。从而，一九二〇年一月，北京政府颁布政令，正式撤消呼伦贝尔“特别区域”。设善后督办公署，而副都统公署制仍保留，实行蒙汉属人行政。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奉黑龙江省之命进驻呼伦贝尔地区的庚玉田旅长，以武力威胁呼伦贝尔当局，宣称：“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限三天内即行撤消”，云云。在这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凌升出于保护蒙旗地方的自治权力，不顾个人安危，突破种种障碍，秘密前往北京，向中央政府告状，揭发庚玉田的违法行为，终于粉碎了黑龙江军庚玉田的民族压迫政策，保护了民族地方利益。由于凌升的积极奋斗，呼伦贝尔地方民族自治权，维护到“九·一八”事变。

民国时代，凌升前后任过：呼伦伦尔善后督办公署咨议、黑龙江省公署咨议、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和蒙疆经略使公署顾问，北京政府咨议等职。

一九二九年冬，中东铁路事件发生，苏联红军进驻海拉尔地区，在海拉尔成立地方治安维持会，凌升任会长。

“九·一八”前，在凌升的提倡下，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创办报馆，刊行满文的《呼伦贝尔报》，凌升任主编，并为报纸撰写时事评述文章。

“九·一八”事变后，凌升参与了伪满洲国建国的阴谋活动。伪满洲国建立后，被任命为兴安北省省长。后因反抗所谓的日满国策，加以“通苏通蒙”罪名，于一九三六年四月，被日本关东军杀害。

福龄。字松亭，海拉尔达斡尔人，前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的次子，凌升的胞弟。呼伦贝尔八旗学校毕业后升入齐齐哈尔

中学。历任呼伦贝尔索伦右翼旗骁骑校（副佐领）。一九二四年与郭道甫被派为呼伦贝尔地区代表，前往南京出席中华教育改进社全国会议。会后曾去广州游览。一九二五年以呼伦贝尔地区代表的身份出席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八年任呼伦贝尔保安队统领。

伪满洲国成立后，任兴安北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一九三六年三月，当“凌升事件”发生，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驻海拉尔宪兵队逮捕凌升，进行搜查住宅时，福龄直爽倔强，硬拉着兴安北省警备军顾问寺田利光，到驻海拉尔日本骑兵军集团长笠井中将那里，以强硬态度、理直气壮地提出抗议，质问笠井：“为什么逮捕凌升，凌升究竟犯了什么罪？”要求立即答复，笠井理屈词穷，顿时法西斯凶相毕露当即叫宪兵队把福龄也抓了起来。

春德。字子馨，海拉尔达斡尔人，凌升的妹夫。呼伦贝尔八旗学校毕业后，升入齐齐哈尔中学。曾在郭道甫创办的私立小学当教员，同时加入呼伦贝尔青年党，与郭道甫关系密切。历任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案公、奇乾县税务局长。一九二九年被派为呼伦贝尔地区驻南京蒙藏委员会代表。“九·一八”事变后回到海拉尔。

伪满洲国成立后，任兴安北省公署警务科长。一九三二年冬，东北军爱国将领苏炳文在海拉尔举兵抗日时，春德积极支持，为此事给南京政府发出密电，而且准备随苏炳文退入苏联国境，转去南京，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事后，为这事受到驻海拉尔日本军部查问，经凌升说情，日本人以“不扩大事态”，没有追查责任。此后，他被任命为海拉尔警察署科长。一九三五年六月以随员身份参加了“满洲里会议”。不久被任命为兴安北省警务厅厅长。一九三六年三月以“通苏通蒙”罪名，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杀害。

华林泰。字泽五，海拉尔达斡尔人。呼伦贝尔青年党创始人之一福明泰（又称敖明泰）的胞弟，早年加入呼伦贝尔青年党。一九二三年留学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一九二五年以呼伦贝尔地区青年代表名义，出席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经郭道甫的推荐，为冯玉祥将军的驻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不久回到海拉尔。一九二六年去苏联布里雅特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会见该政府主席玛莉娅·萨哈娅诺娃。一九二八年，郭道甫组织青年暴动时，华林泰积极响应，做宣传工作。

伪满洲国建国后，任兴安北省公署秘书兼凌升省长的日语翻译。一九三五年以随员的身份参加了“满洲里会议”。一九三六年三月，随凌升参加兴安四省省长会议。会后，以“通苏通蒙”罪名，在新京被关东军宪兵司令部逮捕。

以上所述，不是“事件”的全部，仅是我个人所见所闻、能够回忆起的点滴情况，难免有遗漏之处。本文在撰写中得到受害者亲属色布精太、吉伦（福龄之女）、倭克泰（华林泰次子）、武云毕力格、葆定、恩克巴图、色尔森太等同志提供情况的在此表示感谢。

一九八五年六月

于呼和浩特

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十三团

敖兴然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苏联对日宣战，日本投降，伪满洲国垮台，东北解放。不久，共产党、八路军挺进东北，开辟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侵吞人民抗战胜利的果实，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援下，抢占了东北的一些地区。

这时在大兴安岭东麓的一些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和各种反动武装蜂涌而起。国民党更是千方百计地搜罗旧上层分子、日伪军警、宪兵和地痞流氓拼凑“光复军”、“挺进军”、“保安队”等所谓的“国军”、“中央军”。一时，反动势力甚嚣尘上。他们经常骚扰村庄，抢掠牲畜和其它财物，使各族人民遭受了又一次的灾难。在这种情形下，各族人民是跟国民党走，还是跟共产党走，是当时斗争的焦点。当时有些达斡尔族和汉族的伪官吏，为迎接国民党中央军的到来，成立维持会，还建立了一个以伪职员为主的布西县国民党党部；另一部分人尤其是青年坚持跟共产党走，还有的认为时局不定而持观望态度。大多数的达斡尔和鄂温克人，由于大汉族主义的欺压，受到的民族歧视，坚决反对国民党，但对共产党和八路军也持怀疑态度，认为是汉人而不太相信。经过宣传，大部分青壮年很快地接受了革命思想，他们坚决靠近

共产党八路军，并与中共领导的驻防讷河县的民主联军取得联系，经过共产党的帮助，达斡尔人、鄂温克人在混乱的局势下，为保卫家乡，拿起了武器，组织了自己的武装——自卫队，与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不久，民主联军到达这个地区，向达、鄂等少数民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号召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肃清反动武装，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这支民族武装很快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在党和民主联军的关怀下，逐渐发展壮大，成为整个革命军队的一支重要力量。历史证明，它对巩固后方，保卫土改，支援前线，对于整个东北和全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将这支人民武装的成长过程，作一简要叙述。

部队的成长过程

四十三团的前身是阿尔拉大队。汉族人叫它蒙古大队，因为当时也把达族称为蒙古族的缘故。

那时莫力达瓦旗的人口，包括原巴彦旗在内大约四、五万人。少数民族约占一半，其中鄂伦春不足一千人，鄂温克约有三、四千人，达族不到二万人，还有几个人口不多的民族，如蒙、满、回、朝鲜族等。这一地区西北靠兴安岭，西有诺敏河，东面和东南面紧靠黑龙江省的讷河县和嫩江县，以嫩江为界，西南和甘南县相连，西北和阿荣旗接壤。此地多平原，河流纵横，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水草茂密，适宜从事多种经营。由于兴安岭和诺敏河、嫩江水系围绕，都起到了天然屏障的作用，使莫旗境内的百姓没有遭到更大的骚扰。

一九四五年“九三”东北解放以后，莫旗政府所在地是布西街，就是后来的尼尔基镇，这里的民族上层分子为了迎接国民党的“中央军”，建立了维持会，时间不长，根据苏军指

示，撤销维持会，成立地方解放委员会。委员长是伪旗长，也是原维持会会长仓吉扎布，还设有四名副委员长，其中达族二名，汉族二名，他们都是旧官吏，下设机构有几个部（科），但没有维持治安的武装人员。这时布西街的一部分汉族伪职员，以宋寰（小学校长）为首的人，组织成立了布西县国民党党部，并建立了“挺进军”（也有说是“公安队”）大约四、五十人，这些挺进军经常向老百姓索取财物，抢夺好马和鞍具，要吃要喝，欺辱少数民族。对此，地方委员会听之任之，视而不管。

冬季嫩江和诺敏河封冻了，交通便利，旗内外的坏人勾结起来，土匪蜂涌而起。号称什么“光复军”，“挺进军”等。他们对达、鄂族猎民的良马、猎枪、皮货、山珍垂涎三尺。封江不过十天，离布西街三十华里远的甘南县查哈阳镇就被土匪抢光了，这帮土匪纠集了四十多人，拼凑了一个“四季好”溜子，接着又把离此地三十华里的平阳镇一抢而光，并扬言要抢布西街。莫旗当时没有人民的武装，所谓的“挺进军”，只能敲诈勒索百姓，不能够参加战斗。在这种情况下，达斡尔人鄂温克人等为保卫家乡被迫拿起猎枪，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里，组织建立了以达斡尔人为主体的队伍，即阿尔拉大队（全部是骑兵）。队长是阿尔扎布（伪警佐）、副队长是涂长庆（日伪连长）和孟额纳布（伪警官），队员是各屯有枪的猎民和地方子弟，其中还有当过伪军警的人。这些人都是骑射能手，大约有四、五十人（以后发展到一百来人）。当时阿尔拉大队，如有紧急情况就在阿尔拉屯（这里是达族鄂族居住地）集合，平时在家狩猎、做农活。平阳镇进了土匪后，刚成立的阿尔拉大队就去打了这伙土匪，结果在离平阳镇八华里处莫旗境内的都尔本屯遇上了那四十多人的“四季好”溜子。当时大队都下了马，把马放在一个凹地，包围了屯子，打了一阵，孟文良等

几个勇敢的射手攻进了屯子，活捉了“四季好”的头子，打死打伤他们三十多人，只有二头子和五、六个匪徒逃跑了。经过这一场战斗阿尔拉大队声威大振，群众拍手称好，在这场战斗中队员敖玉山牺牲了。战斗结束后回到布西街给敖玉山开了追悼会，并把抓到的土匪交给了旗解放委员会。接着肃清了旗内各个努图克的小股土匪。正在抢劫前沃尔屯和后沃尔屯的七名土匪，被大队包围之后，只派了鄂树祥一个人进屯喊话，命令土匪投降，否则就地待毙，土匪吓坏了，拱手交了枪，乞求饶命。当时大队考虑到民族关系和今后的工作，教训他们一番，在他们认识自己的罪过，决心痛改前非的条件下释放了他们。这之后，全大队的人马开拔了，在登特科努图克境内的王家窝堡，碰上了三十来人的土匪，没有经过战斗就缴获了他们的全部枪支弹药，并都放他们回家劳动去了。最后全大队又开到布西街，包围了挺进军的住处，被围困的挺进军请求当地的头面人物金××等出面讲请，保证从此不作坏事，不再骚扰百姓，这样，阿尔拉大队考虑到蒙汉民族关系，决定暂时不缴他们的武器，只把挺进军的队长叫到解放委员会，边训斥边教育，然后就把他放回去了。这时大队撤回阿尔拉屯，途中，走到乌尔科遇见在讷河县境内的光复军某团，大约七八百人，其中一部分队伍已经进入莫旗管内的布西街南二十华里的地方，此地靠近嫩江西岸的西拉金等屯，他们派人送来了白酒和猪肉，还要求合作，阿尔拉大队拒绝了这个要求，把送来的物质全部退回去了。

阿尔拉大队在布西街和挺进军发生摩擦时，民主联军的部队已经开到城外三里远的绘图莫尔丁屯，部队停在屯内，只派侦察员前去探听情况。在阿尔拉大队从布西街撤退时，民主联军也由绘图莫尔丁屯连夜撤退到查哈阳镇，联军找了一个达族青年苏蒙扎布，给他讲了党的民族政策和革命道理，最后他决

定给民主联军送信，他拿着联军王文写的信去找阿尔拉大队，他走到喀牙都尔屯遇见了阿尔拉大队，队长读了信以后，召开紧急会议，经过全队的统一认识，最后解除了对八路军和民主联军的猜疑，知道了联军是帮助少数民族的。于是，派人到离查哈阳五华里远的哈力浅屯在图庆格家与民主联军会谈。阿尔拉大队同意和民主联军一起参加解放布西街的战斗，同时约定在大田社会师，会议又研究了战斗部署。天亮时攻打布西街的战斗就开始了。阿尔拉大队由南面进攻，民主联军由东、西、北三面进攻，布西街被困之后，挺进军没战斗力，被迫放下武器，国民党党部也被迫解散了，只有挺进军的头子阎家德等几个人据说他们去东门外赌博，不在营房内而漏网逃脱了，其它的人全部就擒。漏网的这几个人逃到黑龙江海林县一带投奔“座山雕”匪帮去了。布西街终于获得解放，这时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左右。

民主联军初到莫旗，总指挥是王文，他的正式职务是一个专区的专员。他来到后给汉人和达斡尔人分别开了多次会议，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宣传共产党毛主席为国为民的事例，宣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理和建设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宣传各民族一律平等，党对弱小民族扶持等。他首先着手培养青年积极分子，组成了一名蒙族青年和十多名达族青年的布西工作大队，把其中乌嫩、敖东来等七人发展为中共党员，并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上旬建立了党支部，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布西工作队成立后，人数不断增加（它是莫旗内蒙人民革命青年团的前身），同时也建立了布西旗人民政府（后改为莫旗），旗长是孟希舜（达族，伪莫旗科长），陈力新为副旗长（他是王文同志的秘书），参议长潘梦臣，同时将阿尔拉大队改编为第八旅。

建立第八旅的经过

一九四六年二月初，阿尔拉大队根据一月份在葛根庙召开的内蒙古东部地区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了东蒙自治政府，整个东部地区划分为六个盟，同时决定建立自治军的精神，在取得嫩江军区同意后，把阿尔拉大队改编为东蒙自治军第八旅，不久，根据承德“四·三”会议，改为内蒙自卫军第八旅。阿勇巴图（日伪校官）为旅长，孟和巴雅尔（伪官吏）为政委（这两个人不久就调到纳盟工作），阿尔扎布（原阿尔拉大队的大队长）为副旅长。旅下有二个团，其中二团是当时巴彦旗的自卫大队，由达、鄂、蒙三个民族组成的。一团团长涂长庆（伪连长），政委萨永明（教员），这两个人都是鄂温克族。二团团团长郭明元（伪连长）（政委已记不清了），团和连的干部有伪职员和伪军警，还有从农村来的战士。但团和连队里的人数不多，编制不满，全八旅才有四、五百人，其中达族人占多数，其次还有蒙族和鄂温克族。战士有的是骑自己的马，有的是老百姓支援的马。

部队的任务和发展

第八旅成立后受嫩江第二军分区的领导指挥。当时的任务是剿匪，并在莫旗和巴彦旗境内以及和邻近县的交界处设防，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并向老百姓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蒋介石假民主真反共的阴谋。同年二月下旬和三月初，同第二军分区指挥的其他部队一起参加了攻打光复军的战斗。在解放讷河的战斗中八旅负责城的西北角，敌人逃窜时，八旅出击，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接着又参加了攻打嫩江县的战斗，最后解放了嫩江县城。经过这些战斗，锻炼了这支部队，同时枪支弹药以及军需给养也得到了补充。此外，苏联红军于

四月份撤退时，八旅第一团两个连的兵力去扎兰屯协助安定地方秩序。

在解决军需方面得到了王文同志的协助，他当时是龙江省建设厅厅长。他从民主联军单军装中拨出一百套支援了第八旅。八旅将纳河筹办处的一座砖房卖掉后，从齐齐哈尔市场上收购了日军曾穿过的单衣二百多套，解决了八旅战士的夏季服装。剩下的钱派人又从黑河、孙吴县一带买回了一部分枪弹。当时莫旗财政非常困难，只能供给部队小米和一点菜金。同年五、六月份，第八旅整编为内蒙自卫军第五师四十三团。

一九四六年四月，经中共西满分局批准，在扎兰屯正式成立了纳文慕仁盟。管辖布特哈旗、阿荣旗、莫力达瓦旗、巴彦旗（除了喜扎嘎尔旗划给兴安盟以外都属伪满兴安东省行政区划范围内的），但以后撤销巴彦旗的建制，归属莫旗领导。在此前不久，扎兰屯建立了中共工委，后改称中共纳盟工委（即后来的纳盟盟委）。五月中旬，在扎兰屯建立了归兴安军区建制的第五师（后改编为内蒙军区）。原八旅改编成为五师的一个团，团长是涂长庆，政委记得是索岳尔图，副政委是萨永明。宣布后不到一个月，师部就派来副政委于明以及军政干部学校毕业的十多名青年到了莫旗，后将该团改编为第五师的四十三团，团长是敖英贵（原伪军连长），政委是于明，在部队改编和整顿时建立了团组织和党组织，逐步清理了伪军警出身的和不好好工作的干部。他们有的被送入军政大学、有的劝其离队回乡生产。他们原来的工作由军政干校毕业的青年和当地的知识青年接替。在四十三团到乡下做扩军动员时，有一批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青年补充进来，纯洁和壮大了队伍，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经过诉苦运动，很快提高了部队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建团时只有一个中共党支部，以后各连都建立了党支部，也设了内人团支部（后改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团共

有四个所属连队，其中有一个机炮连。

四十三团流动于莫旗和邻近旗县境内。那时自称为光复军的土匪很多，一帮一伙无恶不做，抢掠百姓，奸淫妇女，杀害土改工作队员。四十三团在四六年的秋冬两季和四七年春夏两季进行剿匪，经历了多次战斗。其中最激烈的是一九四六年八月中旬在阿荣旗境内亚东镇的一仗。当时的土匪“文武溜子”自称是国民党光复军东北保安队总司令，共有五六百人。他们是由几股土匪暂时汇合起来的，当时流动在那一带的四十三团只有八十多人，敌众我寡，地形又十分不利，敌人装备好，还有好几挺轻机枪，而四十三团的八十多人只有一挺重机枪，被包围在两山中间的平原上，敌人占领了有利地形，并喊话：“活捉老蒙古、活捉老鞑子、活捉八路军”等，在这紧急关头，四十三团的指挥员当机立断，命令全队立即占领山头，敌人也正向这个山头高地运动，双方拼命地争夺着，我方终于比敌方抢先占领了高地，控制了战局。战斗一直在进行着，从上午开始到傍晚才打退了敌人的包围。在战斗中我方伤了四人，敌方被打死八人。这次战斗结束后，在离青山堡又和这帮土匪打了一次大仗，最后这股土匪被打跑了。此后不久，又和抢劫莫旗境内东毕台屯的土匪即“好友溜子”那一帮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战斗，打死打伤不少敌人，剩下的六、七十人在夜间逃跑了，我方只受伤两人，经过这几次战斗，四十三团军威大振，深受群众欢迎，敌人闻风丧胆，比如在元宝山的战斗中，我方只有一排兵力，外加三十多个民兵，而土匪却有三、四百人，双方打了几个小时以后，土匪就溃逃了。十一月份，在莫旗管内的太平桥屯和土匪“文武溜子”那伙打了一仗，土匪二百多人，我方才有六七十人，当敖霍常、敖平山两个同志骑马勇敢地冲入屯子时土匪惊慌地溃散了，在追击中打死两名土匪，我方也有一名受伤。这以后大帮的土匪都化整为零向莫旗和阿荣

旗的边远地区逃窜。

一九四六年秋天，国民党在辽宁、吉林一带猖狂地向此进犯，但北满一带还很稳定。在后方民主联军剿匪节节胜利。此时在莫旗及附近旗县活动的土匪接二连三的受到四十三团的严厉打击。在这种形势下，他们为了保存实力，伺机而动，假装向四十三团投降，而四十三团的目的是要消灭他们。上级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就指示四十三团和他们谈判。这样就暂时把他们改编为莫旗太平努图克民兵连，规定在太平努图克管辖范围内活动，他们共有三、四百人，吃住都由努图克政府给予。土匪本性难改不受规定约束，经常到汗古尔河努图克及纳河县境内等地抢掠，四十三团在都尔本屯把他们打散了。这股土匪多数是国民党兵和伪军警，枪支好，子弹充足，战斗力强。被打散的土匪分成小股，每股都有名称：“青山豪、壁垒、好友、文武、花蝴蝶”等，其中人数较多的几支是“文武、壁垒、花蝴蝶”，四十三团和驻防附近旗县的兄弟部队一鼓作气打垮了他们。此后，这一带就较为安定了。

一九四七年四、五月份，基本上肃清了土匪，为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了年底，基本上肃清了纳盟地区和附近地区的光复军、土匪。保证了全盟生产的发展，有力的支援了前线。

四六年冬天，财政困难，军需物资的供应也相当困难。嫩江军区只拨给四十三团二百套棉军衣，听到取货的同志说明了困难，又多给了十套。四十三团共几百人，不可能每人发一套，对不能御寒越冬的才发给棉军装，其余的人就穿破棉衣和旧白羊皮大衣，脚穿旧毡疙瘩过了冬。四十三团吃的是粗粮，每星期才能吃一次白面，喝一次有点肉的菜汤。每人每月的津贴只能买三、四两黄烟。但全团情绪饱满，不论白天黑夜，不论数九严寒，土匪出现在哪里就战斗在哪里。

四十三团剿匪、安定后方，保卫盟首长的安全。当时纳盟地区没有民主联军驻防，夏辅仁同志来时只带一个警卫排，不久他们到前方参战，由四十三团出一个排负责警卫工作。

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四十三团在莫旗只留政治部、生产部和第三连。其余的人马都迁到扎兰屯剿匪。他们到扎兰屯不久，驻扎兰屯的四十二团就开赴前线了。八月份，在莫旗的留守部队和生产部一共几十个人，其余的全部都转移到扎兰屯。到了四八年初，在莫旗只留了一个生产小队，共有二十来人。剩下的都转到扎兰屯生产处了。留下的生产小队的人，到年末前，也都调回团部，把原有的生产设备交给了地方。

四十三团进驻扎兰屯后，根据盟委指示进行了整顿和改组，团长，副政委、参谋长入军政大学学习，并提拔一批优秀青壮年为团、营、连干部。于明任团长兼政委，原机炮连连长孟林元为副团长兼参谋长。以后四十三团在内蒙军区和纳盟委的领导下又进行了整顿和改组。

四十三团缴械和整顿了莫旗公安队。经中共纳盟工委批示，一九四六年七、八月，把三十来名公安队员的枪全部缴械。公安队长被关押一个多月，释放后被送入军政大学学习。其余的人有的留用，有的回乡。

一九四七年五、六月间，四十三团路过阿荣旗也缴械了旗公安大队。经过是事前通过我方派进的人（鄂温克族青年，四七年齐齐哈尔军大毕业大家都叫他小八路）接应。他每天早晨五点钟带队出操，我方乘机进入营房把枪缴获，公安队长被关押，其它人员都交给地方政府安排处理。

一九四七年的八月又获缴了布特哈旗卧牛河努图克几十人的地主武装。同年在中共纳盟委直接领导下，协助扎兰屯地方镇压了反动组织和敌特人员，改组了军事机关，安定地方秩序，保证了生产和全盟的土地改革，巩固了后方，支援了全国

的解放战争。

一九四七年末，四十三团番号撤销，编入独立三团，到此时四十三团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第五师整编为独立三团

一九四七年内蒙军区所在第五师整编为独立三团。于明任团长兼政委，孟林元为副团长，沙坨（鄂温克族原教导团的副政委）为副政委。团下设三个营，第一营驻扎兰屯，在四月份以后就开赴前线了，第二营驻阿荣旗那吉镇，第三营驻防布特哈旗成吉思汗镇，还有一个独立连直属团部并做团的警卫工作。此外还有一个通讯排。四八年春，为支援前方独立三团输送了一个营，其中绝大多数是原四十三团的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以后这个营又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四八年春独立三团基本肃清了纳盟地区的残匪，并根据中共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除肃清纳盟地区残余土匪和保卫地方以外还进行了大生产，同时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到了四九年春独立三团合并到内蒙军区警卫团了。

在土改与建设中的活动和任务

四十三团成立后，主要进行了剿匪和保护土地改革的工作，以后又协助地方搞土改，建立乡村政权，发动群众搞生产建设，支援前线。在斗争中四十三团得到了锻炼并调给地方一批优秀的干部，有的当了土改工作队队长、区委书记、旗委书记等。

模范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四十三团建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所到之处都注意了军民关系，经常帮助群众扫院子、担水，解决困难，特别是到少数民族村庄，首先向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

务，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消除各民族之间的隔阂。这样部队所到之处深受群众的爱戴，他们拿出牛奶、稷子米、荞面合饼（达族人叫达拉布达）送给亲人吃。上了年纪的老人，拿出自己最喜欢的黄烟给子弟兵抽，群众踊跃参军，在剿匪中积极当向导，送粮、送草、出担架等。

四十三团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团领导经常给他们上课，如中国近代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党章，适应了部队发展的需要。四七年秋天从基层中提拔了排、连、营级干部，还提升了一名团级干部并向地方输送一批干部，其中有的被送到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多数都回到莫旗的党政军机关中工作。

四十三团在剿匪中，有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听信敌人的反动宣传，对共产党表示怀疑，他们和反动地主陈子华纠集在一起，在四七年秋末组织了二百左右的武装，反抗共产党、反对土地革命，当时在中共纳盟委领导下，四十三团派出了两个连兵力和驻防嫩江的民主联军一起，经过几次战斗后，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压力为辅，对他们进行分化。四八年春天，巴彦旗旗委出面和他们谈判，解散了这支武装，并让他们回家生产了，在这过程中，陈子华逃跑了，后来在五一年镇压反革命时，在本溪抓住押回莫旗处决了。

四七年土改时，阿荣旗×××等屯，几十户农猎民由于受龙江县来的姓李的逃亡地主谣言：“共产党共产共妻，土改中不仅地主、富农被斗被分被打死，中农也和他们一样被打死”，“中央军已经打到碾子山了”等等，在李某的煽动下，这几十户农猎民包括家属二百余人，为迎接国民党中央军组织了反动武装，反对共产党、破坏土改。在四十三团的压力下寸步难行，无法活动，最后被迫逃到兴安岭山林中在绰尔河上游居住，在四八年夏季时也用同样方法解决之。让他们回家安心生产。四十三团所做的这些，加强了民族之间的团结，密切了

党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因此四十三团受到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在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

贯彻党的自给自足的方针

一九四六年四十三团成立时，地方财政收入少，经济困难，军粮、军草、菜金都极有限，冬夏各一套军装，还有一点办公费用，此外无其他经费。部队就与讷河县八路军的冯专员联系，他们出钱，团里出人收购当地元豆、小麦，然后用木帆船运到齐齐哈尔从中得利，两家分红，搞了两次以后，存下本钱就自己单独搞。因为本钱有限就向布西街的私商借钱，扩大经营范围，还收购山货、皮张、木耳等土产，那时街内的私商都愿意借钱给团里，原因是莫旗只流通扎兰屯出的纳文慕仁盟的钱票，盟外不能流通，他们办不了货物，所以借钱给我团生产部，到齐市卖完东西后，就还给他们东北币，他们就可以外出做买卖、获利润了。由于我经营有方，获利不少，改善了战士的生活，又给每人买了一条灰毯子。这以后又派专人去孙吴县一带收买光复时日军遗弃的枪弹，补充自己的不足，又拿出一部分钱给地方民兵，帮助他们在兴安甫建立了小型的制酒厂。在布西街内，开设油坊、面坊、糖厂、缝纫厂、军械修配厂等，这样既改善了战士的生活，又解决了骑兵用的马鞍具的修补和挂掌。

四十三团又将战士们参军时个人骑来的马、鞍具、枪支做价付给了本人钱，减轻了人民政府的负担，本人也都满意，在群众中影响很好。

四八年初独立三团成立了，原第五师所属各部队的生产又扩大了经营范围，有商店、作坊、毡疙瘩厂，毛毯厂、铁工厂等十来个厂坊，同时第三营抽出一部分人力开荒一百余晌，种上稻子，团生产处种了一百多亩蔬菜，此外在莫旗还种了三百多亩大田。

部队还到新巴尔虎左旗打捞食盐、入山伐木，生产所得的钱解决了全团二千左右人的军需。如：鞋、袜子、毛巾、肥皂、毡疙瘩、羊毛毯子，还有子弹、骑兵用的鞍具修补费和购买马笼头嚼子等费用。

一九四九年，独立三团建制撤销，与内蒙古军区警卫团合并后，在葛根庙驻防时，全团做了一套衬衣裤。独立三团撤销之后，在扎兰屯所用的二、三十辆木制车、木犁、水车还有几十匹马，以及厂坊设备和农田等都无代价地交给地方，支援了生产。

支援东北解放和全国解放的事迹

一九四八年春，奉内蒙古军区的命令，独立三团抽调一部分兵力支援前线，参加东北解放战争，全团指战员纷纷要求上前线参加战斗。经团里研究决定派第一营去前线参加战斗。这个营绝大多数是达斡尔人和鄂温克人，他们到前线后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军区第一师，参加了围困长春的战役。长春解放后，接着参加了辽沈战役。解放了锦州和沈阳并追击国民党残匪胡图仁戈等，在锡林郭勒盟境内沉重打击了这股土匪，最后只剩一小帮，据说逃窜宁夏阿尔山旗等地，在那里最后被歼灭了。

四十三团的成员多数是达斡尔人和鄂温克人，其中达斡尔人占主要成份。四十三团改编入独立三团后，四十三团的名称就不存在了，经过两年，一九四九年春天合并到内蒙古军区警卫团，全团分散到警卫团各营的所属各连队了。

一九四七年秋天，内蒙军区副司令员王再天同志在扎兰屯作报告时所给予的评价说：“四十三团是模范团”。

一九四八年春天中共纳盟委书记夏辅仁同志在召开的干部大会上说：“没有四十三团就没有纳文慕仁盟”这样的话他重复地说了两遍。这句话整个概括了四十三团的革命活动和在革命活动中所作出的贡献。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呼伦贝尔文史资料选编第三

作者 =

页数 = 68

SS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